



二十世纪全纪录

1955

周丽琼 主编

目 录

中国部分	1
世纪回眸	1
钱学森归国献身国防科技	1
在金门炮战中我军使用的火炮	10
第一版人民币 1955 年停止流通	12
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决定	13
1955 年实行的军衔制	31
1955 年军官职务编制军衔表	3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授衔	37
北京动物园正式命名	44
本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	45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	135
国务院关于选举工作的指示	136
我国与阿富汗建交	140
小资料	140
世界部分	141
世纪回眸	141
柏林墙下的窃听隧道于 1955 年竣工	141
华沙条约组织建立	143
奥地利国家条约结束外国的控制	144
“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失事	145
冰岛拉克斯内斯获诺贝尔奖	146
小资料	147

中国部分

世纪回眸

钱学森归国献身国防科技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抵达首都北京，立即投身到祖国建设之中。在他正式开始工作以前，中国科学院领导建议他到东北去考察一下，那里有许多新兴工业，又有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机构。钱学森欣然同意。

从1955年11月22日到12月21日，整整一个月时间，钱学森从东北的哈尔滨沿铁路南下，一直到港口城市旅大，参观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厂、煤矿、水电站、炼油厂、冶炼厂、化工厂、机床厂、汽车厂、电机厂、飞机厂等等，访问了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在几所大学作了学术报告。

此行对钱学森非常重要。一方面，他看到了新中国成立6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迅速发展的情况，感受到共产党巨大的组织领导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此行完成了他对组建力学研究所、发展力学事业的构思。特别是通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春机电研究所和沈阳东北工学院的三次讲演，一次比一次完整地勾画出他的设想。

一回到北京，钱学森就向科学院领导汇报了发展祖国力学事业的设想。科学院院务会议在1956年1月5

日召开，会议认为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条件已经成熟。在那些日子里，钱学森和钱伟长一起，找数学家和力学家座谈，访问北京的几所著名大学和有关研究所，进行各项筹建准备。从钱学森进入国门到力学研究所成立，总共不到3个月时间。这可能是科学院成立最快的一个研究所了。新建的力学所超出了传统的力学范围，完全按照钱学森关于技术科学的思想建立，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科学研究所。

钱学森关于建立力学研究所的重要思想有：

——技术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工程之间的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可以称之为桥梁。技术科学不是工程，它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工业的发展，以新概念、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武装工业，带动工业前进，并促使它不断发生质的飞跃。反过来，要求从事技术科学的科学家根据自然科学与工程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远见地选定超前的研究课题，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技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工程环境下的复杂系统，必须是最大程度建立在自然科学和数学基础上的。一个好的技术科学家应当有能力从复杂的实际问题中捕捉住主要矛盾，提炼出清晰的物理机制，建立数学模型，通过计算，得出与观测或实验相一致的结果，并据此得到工程上有用的定量预测。

——技术科学的目标不是一个具体工程中的个别问题，而是一类或几类工程中带有共性的一般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关于工程的基本理论。除应用力学之外，技术科学还应当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例如凝聚态物质、电子学、核反应、核能和核工程、燃烧、金属的塑性加工成形、运筹学、工程控制论、计算技术、

工程光谱学、工程经济学等。他极力主张学科交叉，提出了化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电磁流体力学、流变学等。技术科学的内容不仅在内涵上要不断深化，而且在外延上也决不可固步自封。

——技术科学工作者应很好掌握数学，使它成为自己的工具，要有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熟悉工程技术中的方法和问题，能把工程技术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到自然科学规律的水平上来研究。在开发一种新的工程技术时，技术科学工作者首先要能对其可能性、可行性和克服困难的主要途径作出判断。

在归国后的东北考察中，钱学森一行于1955年11月23日到达哈尔滨。原来日程安排并无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项。但钱学森本人提出，他有两个朋友在哈尔滨，一个叫庄逢甘，一个叫罗时钧，希望这次能见到他们。陪同的朱兆祥事先知道，罗时钧是钱在美国时的学生，而庄逢甘也属学生辈，现都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

11月25日刚上班，钱学森一行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出乎他意料的是，出来欢迎的竟是学院院长陈赓大将，他是在清晨乘专机从北京赶来亲自接待钱学森的。他一直陪同钱学森参观了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等。

在室外的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面，钱学森停了下来。这是一个非常简陋而又原始的固体燃料火箭试验装置，钱学森很有兴趣地和正在安装调试的教师讨论起来。陈赓大将从旁问道：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听到钱学森这句话，开始十分惊异，继而变

得兴奋起来。他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多年以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赶回哈尔滨，专门请教钱学森的。也许是因为这句话，就决定了钱学森从事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12月下旬，钱学森从东北回到北京。不几天，就在陈赓陪同下，会见了彭德怀。谈话是直截了当的，没有寒暄，没有客套。

彭德怀说：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他问钱学森：我们能不能先搞出一种短程导弹，比方说射程500公里，这需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估计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造出来？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搞导弹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一支搞研究和设计的队伍，需要建一些地面试验设备，也需要有专门的加工制造工厂，原材料可能需要全国各有关部门的支持。至于人力、物力，这需要仔细估算一下。而时间嘛，美国从军方开始支持搞导弹，到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10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5年时间我想是可以的。

彭德怀很高兴，又向钱学森请教了一些导弹的技术知识。彭德怀听得很有兴趣，觉得听钱学森谈话很长知识和见识。于是对陈赓说：我们的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艺儿，你安排钱先生给高级干部讲讲课。于是钱学森又在1956年元月，给我军将领作了火箭导弹技术的讲演。在总政排演场，一连讲了三天，盛况空前，引起我军高级将领的极大兴趣。

1956年2月初，一个周末的下午，叶剑英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作陪的是陶铸，谈话的主题也是导弹问

题。谈话气氛十分融洽，越谈三人对火箭、导弹的兴趣越浓，越谈他们的心情愈加迫切。叶剑英便直接提出，希望钱先生在科学技术上主持这件事。为祖国效力是钱学森多年的宿愿，祖国的强大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所以钱学森并不犹豫，当即表示，感谢领导的信任，将努力为之。

叶剑英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立即起身说：今天是周末，总理他们可能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地）跳舞，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叶剑英带着钱学森他们驱车来到三座门，果然周总理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一曲结束，叶剑英趋步走向周总理。总理认真听着叶帅的叙说，频频点头，显得十分高兴。好啊！周总理说，我很赞同你们的想法。总理迈着潇洒的步伐，向钱学森走来。他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完全赞成。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几天以后，也就是1956年2月17日，一份由钱学森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便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的航天事业。《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意见书》还开列了一批可以调来参与这一事业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庄逢甘、林津、胡海昌等。

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

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会议决定按照钱学森的建议，组建导弹航空事业的科研机构、设计机构和生产机构。国务院任命聂荣臻为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钱学森为委员。遵照中央军委的决议，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由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建议建立导弹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

中央书记处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初步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表示：大家放手去干，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书记处承担。于是钱学森立即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8日，正好是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由聂荣臻主持，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车道沟兵器招待所宣布成立。投身新中国第一个远大规划

1956年春，钱学森积极参与制订新中国第一个远大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12年科学规划）的工作。这一规划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由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领导人具体组织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参与制订的。钱学森作为一名火箭技术专家，由他主持，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它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了国家长远规划，勾画了这一尖端技术的发展蓝图，对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发展科学技术12年规划的重要成就，除了制定57项重大研究任务以外，最重要的是确定了六项紧急措施，

亦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6个项目是关系科技发展全局的关键点或生长点。但在当时，却还有不少争议。当时一个主要的争论是，我们国家要不要搞导弹，能不能搞导弹？导弹和飞机的关系是什么？此一争论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时摆到了桌面上。

钱学森在发言中认为，飞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导弹确是一种新的有巨大威胁力的武器，其作用在二次大战末期已现端倪，希特勒德国就使用了V—1、V—2导弹。飞机与导弹各有优缺点，在战争中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飞机的机动性好，但导弹的优点是它的速度快，这在战争中无论是从攻击或防御的角度看，都是一个重要的战术技术性能。他又从技术上指出，导弹虽然是一种新武器，但攻克火箭导弹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因为导弹是无人驾驶的一次性武器，而飞机则有人驾驶，且要求多次使用，这在发动机、结构、材料和飞行安全等问题上都有许多特殊要求。他介绍说，发展导弹在技术上也会遇到许多难关，比如制导问题。这也是当时大家不知道导弹为什么会自动飞向目标的一个神秘问题。针对这一情况，钱学森给大家讲解了许多制导的原理，其中包括洲际导弹的制导原理。他对制导技术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剖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在短期内易于突破。所以导弹作为一种现代武器，应及早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列入重点项目予以突破。钱学森的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自然为很多人所接受，并统一了大家对导弹问题的认识。

电子计算机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在当时，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项目。钱学森举出许多实

例，说明推进快速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钱学森还提出，过去数学家所能研究的方程是线性方程，而实际问题中所遇到的却是非线性方程，如流体力学方程。过去由于没有先进的计算手段，对于非线性方程只好采用线性近似的办法，这就丢失了原来方程式中所蕴含的许多特点。有了计算机以后，就可以用数值方法来求非线性方程，当然也因此提出了发展计算数学的种种理论问题。钱学森还举出电子计算机可以下象棋的实例，表明可以代替人的部分思维。那时有人怀疑电脑怎么会胜过人脑。钱学森回答说，人的计算远不如电子计算机快捷，人脑工作久了会疲倦，所以，电脑在某些方面能胜过人脑。钱学森还介绍了电脑的记忆功能、逻辑功能、甚而学习功能等等，指明这是极有发展前景的领域。于是，这一重大项目的决策就此确定下来了。

钱学森除了对上述 6 项紧急措施的决策做出许多重要贡献以外，还提出或指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科学想法。例如，他曾讨论到水翼船对我国国防以及水上交通的重要作用。

钱学森也十分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他指出统计物理和量子力学均在工程技术中有重要意义。钱学森还竭力提倡运筹学 (Operational Research) 的研究。他既谈到运筹学在交通运输以及经济规划中的作用，也讨论到在两军对抗情况下运筹学的运用问题。由于钱学森的提议，我国开始了对运筹学的研究。为我国卫星事业呕心沥血

1958 年 5 月 17 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此后，钱学森便一直在思考我国卫星事业的发展问题。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机构。

1961年6月，在钱学森、赵九章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开始举办了持续12次的星际航行座谈会，钱学森在第一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讲演。他除了介绍苏美火箭发展的情况以外，还从科学上指出：在航空飞行中，我们总是同空气动力打交道；而在星际飞行中，气动力问题是次要的，重点是重力、推力及惯性力问题。所以，重力场问题非常重要。所谓最优发射轨道、最优飞行轨道问题，主要是尽最大可能，使重力垂直于轨道，使推力垂直于重力。在星际航行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全新的问题。

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安排预先研究课题。钱学森提出，先放探空火箭和气象火箭，为研制运载火箭和放卫星储备技术，积累经验。

到1964年，东—2试验成功以后，钱学森感到发射人造卫星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基础，于是在1965年1月8日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聂荣臻很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1965年4月29日，国防科委向中央专门委员会报告了张爱萍邀请张劲夫、钱学森、孙俊人及国家科委、国防工办专业局的负责同志和专家进行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重量为100千克左右的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的设想。

1970年4月24日，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轫等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重173公斤的卫星发射成功。这颗卫星向全世界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1970年7月，钱学森调到国防科委担任副主任。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开阔的眼界，从更高的层次上，思考我国国防科学技术中许多其他领域的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并提出过许多富于创新的、超前的见解。

由于钱学森对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和整个科学技术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

人们一般喜欢称钱学森为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但钱学森本人不同意这样的称呼。他说，导弹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事业，一两个人是无法搞成功的，其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而他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做了他该做的事情。

在金门炮战中我军使用的火炮

金门炮战的我军火炮。

我军使用了美式75毫米M-1山炮，还有为了对抗金门的蒋军的美国M-59型155毫米加农炮（20门），从北

方紧急调来了 6 个远程加农炮营，这些炮兵装备有苏联的 BP-2 也就是 M-1935 型 152 毫米加农炮，这种炮其口径为 152 毫米，弹丸重 48.8 千克，初速 880 米/秒，最大射程 25.7 千米，战斗状态重 18200 千克，威力巨大。这样看来我军很可能也在炮战中使用过 105 毫米的日美榴炮。

各种火炮：

加农炮

苏联 M-46 型 130 毫米加农炮，这种炮是苏联 50 年代初期服役的一种火炮，我军在 1955 年初的攻击大陈和一江山岛作战中已经使用，也就是进口的时间在 1954 年底前，几乎跟苏军装备同步。

苏联 D-74(M-1955)型 122 毫米加农炮，苏军是 1955 年装备的，同年我军接受了这种火炮，基本跟苏军同步。

苏联 A-19(M-1937)型 122 毫米加农炮，这种火炮比较陈旧，D-74 就是替代它的，我军在 1955 年曾经使用过。

苏联 D-44(M-1945)型 85 毫米加农炮和国产 1956 式 85 毫米加农炮，这种炮苏军当时也是大量装备，1955 年改进此炮（弹道性能没有改变，小范围改进，我军也相应改进了国产同类炮）。

苏联 D-10(M-1944)型 100 毫米加农炮，属于二战中威力最大的牵引反坦克炮，我军在制式化期间没有仿制这种炮，我觉得因为是我军没有合适的牵引车，而且制造这种高膛压的火炮，当时的兵工厂也没有能力（就跟 D-10T，也就是 59 式坦克使用的 100 毫米炮是 1963 年后开始批量生产的一样），当时苏军从 1955 年开始装备改进型(M-1955)，我军只是部分军属炮兵中装备这种

炮，数量较少。

苏联的 M-30 (M-1938) 型 122 毫米榴弹炮，以及国产 1954 型同类炮，当时苏军也是装备这种炮的，直到 1964 年开始装备 D-30 型 122 毫米榴弹炮，我军跟苏军当时基本同样。

苏联 M-10 (M-1938) 型 152 毫米榴弹炮以及国产 1956 型 (D-1) 152 毫米榴弹炮，D-1 是 M-10 的改进型，也叫 M-1943 型，其实就是使用 M-30 炮架的 M-10 型改进的，苏联是 1955 年开始装备 D-20 (M-1955) 型替代前两种火炮的，当时苏军中还拥有大量的前两种火炮。

苏联 M120 (M-1937) 型 152 毫米榴弹炮，苏联在二战中使用的主要火炮，1955 年开始由 D-20 型替代。

苏联 D-20 (M-1955) 型 152 毫米加榴炮，前面说过苏军从 1955 年开始装备，我军同时也装备了此炮。

至于 120 毫米和 160 毫米迫击炮，都是当时苏军的装备型号，我军也大量装备。

从以上可以看出，韩战后，我军迅速现代化，短短几年内，陆军主要火力的炮兵装备水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主流先进水平。

第一版人民币 1955 年停止流通

第一版人民币 1955 年停止流通，所以成了今天市场的收藏珍品。

一版纸币潜力大。第一版人民币正日益成为钱币投资者所关注的品种，它主要是指 1948 年 12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发行的人民币。受当时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该套人民币图案主题不够统一，面额大小差别大，

印刷工艺多样，质量参差不齐，加上明显带有战时的特征，因此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货币来使用，到1955年5月10日起被停止流通使用。

目前第一版人民币已成为市场热门品种，几乎在每张邮币卡行情报上都可以看到有关的价格，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除了看行情，最重要的还是看品相，第一版人民币正日益受到投资者的关注。第一版人民币的身价不菲，一些珍品的价格早已达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由于收集整套钱币相当困难，人们逐渐将目光集中到这套钱币的精品上。其中伍圆水牛图、贰拾圆打场图、壹佰圆帆船图、伍佰圆瞻德城图、壹仟圆牧马图、伍仟圆牧羊图、伍仟圆渭河桥图、伍仟圆蒙古包图、壹万圆骆驼图、壹万圆牧马图、伍万圆新华门图、伍万圆收割机图，被专家称为十二珍品。

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决定

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中国人民有骨气的智慧的见证，也是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毛泽东英明决策的展现。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人类历史上的最先两枚原子弹，顷刻间，世界震惊，日本20余万人口伤亡，两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曾经不可一世欲吞并中国和东南亚的日本帝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世界几乎也被炸懵了。原子弹的威力立即弥漫了整个世界，这一半也是美国人在原子弹上做足神秘文章所造成的社会心理震惊。在这之前，战争的双方几乎都不知道有如此威力的武器。美国人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一直是最高机密，就连美国副总统也不知道，一炸足以震乾坤！世人几乎都是在第一次核轰炸后才知道了原子弹，当然包括日本军队。显然，美国人的这两颗原子弹，在关键时刻炸懵了本已经被盟军打烂的日本皇军，是釜底抽薪的一击，同时也向整个世界传递了核威慑信息。

共产党人不信这个邪，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不信这个邪。1945年8月9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美军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消息，并加上了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的标题。毛泽东一看就来气，怎么搞的，这是谁家办的报纸？渲染恐怖，吓唬谁？他将摊开的报纸扔得远远。毛泽东摁灭烟头，抓起电话，要接线员接通延安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负责人博古。

电话打过去时，兴奋得满面红光的博古正与《解放日报》的全体同志开庆祝会，博古喜滋滋地去接毛泽东的电话，脸色顿时煞白，电话里毛泽东口气非常硬狠，一口湖南话透过话筒几乎全体同志都能听清，他说：博古，你搞的是什么名堂，你有没有一个共产党人的立场？你胡说八道啥！你今天的报道是政治性的原则错误，你和相关同志立即到我这里来！在枣园，毛泽东把博古和《解放日报》相关负责人、编辑严肃批评了一个多小时，不应该如此不分清红皂白地渲染原子弹的威力。

翌年，1946年8月6日，面对美国撑腰的装备精良

的国民党部队在全国范围内的蠢蠢欲动，毛泽东没有被威慑住，他在延安枣园的树荫下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谈笑风生，纵观天下，特别谈到了让这个世界丧魂落魄的原子弹，英文翻译将原子弹译为 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认为译成 PaperTiger（纸老虎）才准确。他挥挥手，轻轻一弹烟头，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这句世界性的历史名言，出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之口，宏大从容之气度盈满天地，共产党人敢于同美式装备的蒋介石部队战斗并赢得全国胜利。

毛泽东并非不重视原子弹，更不是表现唐吉诃德战风车式的勇夫，这是历史巨人能够穿透历史的高层建瓴，毛泽东严厉批评《解放日报》社，反映出他从一开始就未雨绸缪，预见到核武器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的双重作用。

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49年10月1日，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等于苏联承诺对中国实行核保护。

谁有了原子弹，谁就不怕讹诈。整个50年代，是新中国的多事之秋，美国至少对中国有过四次核威胁，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第一次就是1950年，毛泽东决定入朝参战，他冒的最大风险就是美国人的原子弹，但他对此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一点动摇。入朝志愿军攻势凌厉，美军节节败退，1950年12月15日，美军退到三八线以南，美国当局一片惊恐，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破坏雅尔塔协定大规模入侵欧洲的牛刀小试，节节败退的麦克阿瑟请求在朝鲜扔

原子弹，阻止赤潮西进。为此，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将采取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所拥有的各种武器，以应付军事局势。他说，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但却不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使用它。杜鲁门下令在关岛地区部署原子弹部队，但美国最终不得不顾忌苏联，不敢下实施核攻击的最后决心。

第二次还是朝鲜战争，打到1953年3月，美国人已付不起人员伤亡的惨重代价，坐上白宫总统交椅的艾森豪威尔恫言使用核武器对付毛泽东。5月1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作战方案：使用原子弹挫败毛泽东的人海战术，包括对鸭绿江以北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20日，在艾森豪威尔支持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这一作战方案。消息传来，毛泽东面不改色，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不怕核战争，并命令志愿军积极做好防核准备，充分利用朝鲜多山地形和多变气候来对付原子弹袭击，与此同时，已经拥有原子弹的苏联政府发表公开的强硬声明：苏联政府对美国在远东使用原子弹不会袖手旁观、视而不见。

第三次是1955年台海危机。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解放大陈岛在内的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会参议院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例如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变成了法律依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进行单独密谈，艾森豪威尔随即在电视讲话中宣称，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第四次是在1958年，恰是中苏蜜月就要结束之时。

蒋介石有了美国人的核武器撑腰,开始将10万地面部队部署至靠近大陆的金门、马祖两岛,异想天开地准备反攻大陆。不打不相识。毛泽东当即命令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给老朋友惩罚性炮击。1958年8月23日晚6时30分,人民解放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大、小金门等岛屿,两小时内向金门密集发射炮弹4.5万枚,几乎炸平了金门阵地,蒋介石难以支撑,金门、马祖危在旦夕,艾森豪威尔立即命令美国在这一带的驻军以常规武器对大规模的进攻作出反应,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原子弹。当时美国对厦门周围的6至8个军用机场实施核攻击,向大陆沿岸地区的5个机场先各投一枚当量为7000至10000吨的小型原子弹后,看看中国的反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向总统建议授权第七舰队司令认为必要时可下令向中国大陆投掷原子弹。

毛泽东不吃美国人的那套,你有你的原子弹,吓不倒我,我大炮照轰,按照计划继续炮轰金门、马祖、软下来的是艾森豪威尔,他还是怕动用核武器的后果,称对任何地区问题都不想使用核武器,并要蒋介石撤出金门、马祖。退踞台湾,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毛泽东和中央意识到蒋介石放弃金马将会削弱与大陆的紧密联系,使台独势力趁机张力,做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决策。至10月25日,历时64天的金门炮战终于一段落。

新中国曙光在即之时,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的想法就已经在毛泽东心中酝酿了。1949年春季,在毛泽东的同意之下,周恩来批准拿出外汇让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在法国订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访苏,更加重了他自己手

里要有原子弹的想法。毛泽东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游览，还看了不少电影，如《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回国后的一天，在毛泽东的房间里，他突然问卫士长：你说原子弹厉害不厉害呀？卫士长回答说：原子弹的威力真大，确实厉害！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0年5月19日，由毛泽东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此后，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从1950年到195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做了基础准备。1953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一行26人前往苏联进修核技术，但此行并没有触及核心技术。

是时，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也直接向毛泽东建议：新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1年10月，居里夫妇的女婿、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他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

1954年秋，毛泽东决定由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观看核爆炸试验。

1955年1月初，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请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科学技术所需要的条件，并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这次会议极为机密，迄今在中央档案之中没有任何正式文字记载和影音资料。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恩来总理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当事人事后的回忆，可见这次会议保密之严格。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驻地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薄一波等参加。会议听取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地质学家李四光介绍核物理和铀矿地质学、钱三强对原子弹从最基本的讲起，用最通俗的语言，把原子弹的原理讲清楚，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听清楚。李四光事先把铀矿石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有人说，这是铀矿啊，结果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伸手去摸。李四光赶紧说：哎哟哟，摸不得，摸不得，这个有放射性。赶紧去洗手，洗干净手再喝茶。李四光还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

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这件事

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主席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周恩来表态说：对人才培养要大力加强。

毛泽东看看大家，接着说：你们看怎么样，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吃饭的时候到了，大家来到餐厅，餐厅里摆了三桌饭菜。毛泽东坐的那桌，他的右边是彭德怀，左边是李四光，钱三强坐在他的对面。因为是毛泽东请客，意义又不一般，破了四菜一汤的规矩，特意加了两个菜，摆了六个菜，毛泽东平时滴酒不沾，这次却特意斟了一杯红葡萄酒。毛泽东站起身来，举杯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中国原子能事业就此拉开序幕。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核武器计划，代号为 02。同年 6 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956 年 1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此后，制订规划活动展开，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有全国 757 位科学家参加，历时 7 个月完成草案。全称为《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提出 57 项重点任务，集中发展核科学等相关现代科学技

术。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组织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

实际上，毛泽东在1955年伊始提出搞自己的原子弹，是他看到，作为一个大国，靠苏联的核保护，毕竟不是办法，也是靠不住的。赫鲁晓夫对中国发展原子弹的想法并不赞同。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5周年庆祝活动。

赫鲁晓夫刚坐上交椅，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1955年底以前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在10月3日中苏领导人最高级会谈时，赫鲁晓夫问毛泽东：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不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吱唔着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搞那东西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

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赫鲁晓夫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接普，又不失时机地提醒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也不同意他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并在内部表明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就用原子弹来说事，言下之意，我有原子弹，你敢离叛我？毛泽东毫不畏惧，这就有了两人间著名的一段对话，毛泽东豪气十足：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赫鲁晓夫心灰意懒：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这样的观点使我很吃惊。在原子弹面前，双方军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谁的军队越多，他的炮灰也越多！原子弹的阴影下，军队只是一堆肉，一堆灰！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回答：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赫鲁晓夫知道了，毛泽东希望自己有原子弹，在自己没有之时，他并不惧怕原子弹，是啊，原子弹再多，也不可能与毛泽东的死一半人相敌。转机出现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为了拉住中国不倒戈，

于1957年10月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弹。

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四个协定。其中1955年1月22日签定了一个重要的共同进行新疆地质勘探，开发采铀矿的协议，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向苏联提供一定的铀。地质部门开始了艰苦的铀矿勘探，在牺牲了十几名干部战士之后，发现了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结果发现，新疆具有丰富的原子核武器的原料矿藏。但是，正规的矿山来不及为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原料。1958年，成千上万的农民漫山遍野采掘近地表的铀矿，他们用双手奉献了第一批150吨铀矿石。

1956年4月7日，中苏签定了关于建设军、民用设施的协议，铺设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预定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

1957年10月，两国政府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苏联首批派出了640名科学家，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放射技术、计算机开发及核武器研究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原子城的选址工作于随后开始，根据地理条件和居民分布情况，参加踏勘的专家们认为青海最合适。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予以批准。于是，几千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这片草原上，开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基础性工作。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1958年6月，中苏合作建立了第一座重水型核实验反应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站着讲话：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

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两枚地对地近程导弹模型，中国科学家也做好了原子弹爆炸的模拟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但苏联专家没有接到苏联当局的指示，以安全系数不高为由，没有进行试验。

靠苏联的帮助发展原子弹的想法很快就破灭了，平地起波澜。苏联的支持是有交换代价的，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个海军舰队的指挥权由苏联控制，被毛泽东一口回绝。毛主席对来谈此事的苏联大使说，中国不同意和平时期在本国领土上建立苏联的海军墓地，我们只同意你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作主人的军事基地。赫鲁晓夫大为冒火，决定报复。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理由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在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冲突过程中，苏联方面无理偏袒印度一方，将中苏分歧公开化。接着，在中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前后的讲话和会谈中，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从容说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固然如，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祖定性。随后，单方面撤走全部援华专家，终止了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596工程在困难中前进

早在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决定组建

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明确的：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1960年7月，苏联撤回了全部1292名在华的苏联专家。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5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1959年6月，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苏联单独撕毁协定后，美、英、法、苏4个核大国对中国在原子科学技术上都实行严密的封锁。毛泽东马上召集政治局会议，在1959年7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简称中央专委），他们是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于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中央强有力的领导，大大加速了我国核工业的建设步伐。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和积极支持下，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勇克技术难关。有关机构相继成立，各项工作协调进展迅速，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铀矿选冶提炼、引爆装置、罗布泊试验场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工作相继展开并取得突破。这里，并不是没有反复。

1961年深冬，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由中央军委的老总们和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出席的不寻常的会议，讨论中国核导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实际就是中国还有没有能力、要不要马上发展导弹核武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刚进行不久，就陷入僵局。一些同志认为目前正艰难地支撑着一个6亿人口大国的吃饭穿衣，大跃进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和自然灾害造成巨大损失，国家急需输血，他们担心再拿出大笔资金发展导弹核武器，无疑会增加国家负担，影响经济的复苏，因此建议暂缓

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

老师们坚决要上。他们认为，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

和导弹，才能早日确立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说话才能有份量，也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封锁制裁及核威慑。因此，老师们建议中央：即使卡紧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干下去。

性情豪爽的元帅外交家陈毅直截了当地说：干！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核导弹。有了这个东西，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而平日沉默寡言的国防部长林彪，也表示支持：原子弹要上，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出来，哪怕架在火上也要把它烧响……

尽管如此，第二次会议在是干还是停的问题上两种意见依然僵持不下。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应该先将中国核工业起步的现状了解清楚，中央再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做最后的决定。经征询聂荣臻元帅的意见，决定由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承担这一重大调研任务。

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砂砾饭，笑谈渴饮枯水浆。这阙充满了乐观豪情的词，正是将军当年率考察队踏遍大漠戈壁时的真实写照。经过对西部一些工厂、矿山、研究所的扎实调研，同核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一个月后，张爱萍将军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调查报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报告认为，我国的核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造成功原子弹并进行核爆炸是可能实现的。

这份在中国核导弹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报告，迅速被中央批准。1962年8-10月，聂荣臻和罗瑞卿都向中央报告力争在1964年或者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

计划设想。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3年9月完成了原子弹图纸设计，1963年12月成功进行了聚合爆轰中子试验。

1964年秋，中国第一颗用于试验的原子弹装配出来，但进行试验却要冒着遭受外来打击的很大风险。中央专委不得不制定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派说：要尽早试验。196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10月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美国确实一直试图阻止中国的核爆炸，欲对中国核设施实行绝育手术。美国从1961年开始，就利用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多次飞临兰州等西北地区，还利用间谍卫星拍摄了多处核工厂及核设施照片。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强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那么，怎样才能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呢？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破裂，最好苏美联手，甚至采取军事行动，迫使中国签署核禁试条约，放弃原子弹计划。1963年7月14日，美国特使哈里曼赴莫斯科，带来了肯尼迪对付中国原子弹的计划。哈里曼同赫鲁晓夫是否愿意采取美国行动或苏联行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赫鲁晓夫拒绝了。把中国原子弹问题当做一个威胁，美国人在企图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

核武器的同时，也研究了单独破坏中国核武器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对罗布泊试验场等目标由美国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或由蒋军实施空中轰炸，或实施秘密的地面袭击。经过权衡，美国人意识到，单独干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美国无可奈何，终于没有采取行动。

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试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1964年9月，在罗布泊戈壁深处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它们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筋水泥工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组装完成后，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核弹运到试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以防可能混进雷管等爆炸物。沿途经过的所有火车都要为专列让路，连横跨铁路线的高压输电线在专列经过时都要断电，以防电磁感应引起电火花爆炸。

1964年10月14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主任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专委确定，原子弹试验的零时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当晚7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好。

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记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

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对着话筒说：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听得出他也十分激动，但他毕竟是总理，用极平静的口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

防化兵进入现场后惊讶地发现，那座 100 多米高，用无缝钢管焊成的，重 80 吨的铁塔，在原子爆炸中竟化为一小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熔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机群已变成一盯相骷髅，坦克则像回炉的一堆赤色毛铁……

当周总理向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毛泽东十分冷静地指示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尽管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分量，他还是再次指示：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毛主席得到了确定的报告：火球变成蘑菇云！他确定是核爆炸成功时，就很快让周总理向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的同志提前宣布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并在当晚 22 时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也可以说，中国的原子弹是被赫鲁晓夫逼出来的，毛泽东讥嘲地说，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这次相当于几万吨 TNT 炸药威力的核炸弹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

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

1955年2月8日，包括军官军衔制有关内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颁布实施。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达了关于军士和士兵评定军衔的指示，规定了士兵军衔的内容，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正式展开。国庆节前，全军军官的军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命令状授予十位元帅。至此，正式揭开了授衔的序幕。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举行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典礼，周恩来总理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次日，国防部进行授予校官军衔的典礼，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官军衔。同年11月至1956年初，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相继举行授衔典礼，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士兵军衔的典礼。

1965年6月1日起，撤消军衔制。

1952年初，总干部部和苏联专家酝酿的方案是设6等20级，即：

元帅3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

将官4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3级：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4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

军士4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

兵 2 级：上等兵、列兵。

1953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对上述方案作了修改：增加大校一级；将上将、准上将改称大将、上将；将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改称大尉、上尉、中尉；其它不变。

1955 年正式实行军衔制时，共设 6 等 19 级，比 1953 年条例草案减少了兵种元帅、准尉两级，即：

元帅 2 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将官 4 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 4 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 4 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军士 3 级：上士、中士、下士。

兵 2 级：上等兵、列兵。

但实际授衔时，应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大元帅衔空缺未授；增加授予准尉军衔，这是考虑到当时我军有十几万副排级干部，军委决定暂时增加准尉衔，以解决副排级干部的衔称问题。

1955 年的军官服役条例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一军官职务，均须在定员编制表内规定其相当的军衔。国防部 1956 年下发了《军官职务编制军衔表》，规定军官编制军衔为一职一衔和一职二衔。

1955 年首次授衔时，评衔条件掌握较严，结果普遍存在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如：军长的编制军衔是中将，而 64 名在职的军长、政委中，只有 8 人被授予中将军衔，54 人被授予少将军衔，还有 2 人被授予大校军衔，低于编制军衔者占 87.5%。师长的编制军衔是少将，但 73 名在职的师长、政委中，只有 3

人被授予少将军衔，70人被授予大校军衔，占95.9%。而且，由于授衔后不少军官又得不到正常晋级，致使这一现象有增无减。

1960年，国防部重新制订了《军官职务编制军衔表》，取消了一职一衔的规定，改设一职多衔，大多数职务设三衔，实际上，主要是将原编制军衔的下限降低了一、两级。

军衔的种类区分和军衔称为1955年军衔制对军官的区分比较复杂，按专业勤务分为指挥、政治、技术、军需、军医、兽医、军法和行政等8类。指挥和政治军官中，又按军兵种分为若干类。各类军官军衔等级如下：

1、指挥军官和政治军官步兵军官：少尉至大将。

骑兵军官：少尉至大将。

炮兵军官：少尉至大将。

装甲兵军官：少尉至大将。

工程兵军官：少尉至大将。

铁道兵军官：少尉至大将。

通信兵军官：少尉至大将。

技术勤务军官：少尉至上将。

公安军军官：少尉至大将。

海军军官——海上军官：少尉至大将。

海岸军官：少尉至上将。

2、技术军官：少尉至上将。

3、军需军官：少尉至上将。

4、军医军官：少尉至上将。

5、兽医军官：少尉至上将。

6、军法军官：少尉至上将。

7、行政军官：少尉至大校。

海军海上军官及技术、军需、军医、兽医、军法、行政军官的名称前，均冠以军种及专业勤务名称，构成这些军官的军衔称为，如海军中尉、技术少校、军法上将等。其他军兵种军官，规定只在将军军衔前冠以军兵种名称，如步兵少将、公安军中将、空军大将等。校官以下人员，无专业衔称，直接称谓其军衔。

军官军衔的批准与授予权限 1955年军衔制对军官军衔的批准与首次授予权限规定得较高。军官军衔首次授予权限：元首由国家主席、将官由国务院总理、校官和尉官由国防部长命令授予。军官晋衔批准权限：少尉、中尉、上尉晋级，由方面军和一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命令授予；大尉、少校、中校、上校晋级，由国防部命令授予；元帅军衔，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命令授予。

由于我军规模较大，中央军委将第一次授予少尉军官和大尉、少校军官的晋级交由各大军区级首长代国防部部长审批，奉国防部长命令公布。

1955年首次授衔时，我军共有60余万名干部获得了准尉以上军衔。其中：

元帅和大将各10人。

上将55人，1956年和1958年又各补授一名。

中将175人，1956年和1958年又各补授一名。

少将802人，1956年和1958年又各补授4名，1961至1964年由大校晋升少将533名。

1955年授衔时，10名元帅平均年龄57岁，朱德最大69岁，最小的林彪49岁；10名大将平均年龄51.7岁，最大的张云逸63岁，最小的许光达47岁；上将平均年龄47.7岁，最大的陶峙岳63岁，最小的肖华39

岁；中将平均年龄 45 岁左右，最大的傅连璋 61 岁，最小的刘西元、张池岳 38 岁；少将平均年龄 43 岁左右，最大的史可全 63 岁，最小的吴忠、徐斌 34 岁。

我军将官中：

女将军一人，即李贞少将，曾任军事检察院副院长。

外国人一人，即洪水少将，越南河内人，京族，曾任军委主办的《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等职，1956 年回国。

解放战争时期起义将领 14 人，其中上将 3 人：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中将 3 人，少将 8 人。

少数民族 34 人，上将 2 人：乌兰夫、韦国清；中将 8 人，少将 24 人。其中壮族 11 人、蒙古族 5 人、藏族 5 人、维吾尔族 5 人、满族 4 人、回族 2 人、土家族 2 人。

1955 年军官职务编制军衔表

主要职务

上将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军兵种司令员、政委

上将——中将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沈阳、北京、南京、济南、广州、昆明军区司令；军兵种副职；军事、政治学院副职；兵团司令员、政委

中将——上将新疆、西藏、成都、武汉、兰州、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其他军区、兵团副职；军种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区海、空军正职

中将军长、政委；新疆、西藏、成都、武汉、兰州、福建军区副职；其他军区、兵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中将——少将海军二等基地司令员、政委，军兵种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直署部部长

少将——中将兵团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海、空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少将师长、政委；副军长、副政委、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少将——大校省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分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

大校——少将海军水警区司令员、政委；总部各下署处处长，军兵种司、政、后下属部（处）长大校——上校副师长、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副参谋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

上校——大校军区海、空军司、政、后下属处处长上校团长、政委

上校——中校师副参谋长、总部一级参谋、助理员中校——上校军司、政各处处长，军兵种及部分军区科长

中校——少校总部、军兵种的副科长；军分区各科科长、二级参谋

少校——中校师司、政各科长，军司、政各副处长，200床位医院院长、政委少校营长、教导员，空军大队长，团副参谋长、后勤处主任，三级军舰舰长、三级参谋

少校——大尉师后勤各科科长

大尉——少校空军团领航主任，四级门诊部主任

上尉——大尉连长、指导员上尉四级舰艇长，五级参谋

上尉——中尉空军大队军械、特设主任中尉——上尉副连长、副指导员中尉——少尉

五级舰艇长，空军中队军械、特设、机械师
少尉——中尉排长
少尉空军副驾驶，50瓦电台台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授衔

1955年9月28日，新华社发布《国务院授予军官将官军衔典礼》的消息。

在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的时候，共有1038人被授予将官军衔，其中5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

上将军衔的设置、评定标准、上将军衔与相关编制等级、职务等级、军队级别的关系，与职务、军队级别组成的军官等级结构是什么呢？

一、上将军衔的评定标准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恢复成立，以下简称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军衔指示》），规定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参照编制军衔，以干部的军队级别为主要依据评定军衔，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

1955年2月，一届人大第6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以下简称《服役条例》），规定授予军官军衔的条件是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的服务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规定每一军官职务均须在定员编制表内确定其相当的编制军衔。

1955年5月，国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编制军衔》（以下简称《编制军衔》），规定兵团司令员的基准职务军衔为上将，兵团副司令员的军衔亦可为上将。

上述评定军衔标准，涉及几个专门名词、专门概念

- - 兵团(编制等级),兵团司令员、兵团副司令员(职务等级 - - 正兵团职、副兵团职),正兵团级(军队级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的武装力量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仍未实行干部等级制度和军衔制度,全军干部、战士在物质待遇方面仍实行供给制度。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总干部管理部成立,这个人民解放军全军干部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责之一就是掌管军官军衔的授予工作。当时,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该部会议上提出建立军队干部等级制度的问题。1951年2月,军委发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确定人民解放军干部的评级工作于当年完成,但后因故推迟到1952年。1952年3月,军委再次发出《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以下简称《等级指示》),明确了评定军队级别的目的是合理解决各种干部的物质待遇问题,并为以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基础;确定了全军干部、战士的军队级别从军委主席、副主席级到战士级共分为23级;制定了《部队及领导干部评级幅度》(以下简称《幅度》);规定了以德(政汉品质)、才(业务能力)、资(资历)标准衡量干部现任职务以确定其级别的评级方法。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亦于1952年3月颁发了依军队级别而定的军队干部津贴费标准,此后,军队干部(军官)仅按自己的军队级别得到相应的津贴费(薪金 - - 1955年1月起军官实行薪金制度),而职务、军衔与津贴费(薪金)并无关联。人民解放军全军评定军队级别的工作从1952年上半年(可视为评定军队级别的标志性时间)全面展开,当年基本结束,从而正式建立了军队干部等级制度。

1952年上半年,实行四级军区(一级军区即大军区、

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军分区)编制体制的人民解放军,共编有6个一级军区暨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东北军区、华北军区,以及与之相当的军委总部的军事学院、志愿军(以下简称大军区);8个兵团(第1、第9、第19、第20、第21、第22、第23兵团、铁道兵团),以及与之相当的二级军区、军种兵种(以下简称兵团)。《幅度》规定,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干部部长的军队级别一般应在正、副、准兵团级范围内确定;兵团及相当于兵团的二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一般应评为正兵团级,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一般应评为副兵团级;同时还规定,个别不适宜者应酌情降低,个别资深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待评为军委委员级(军委委员系《等级指示》确定的军队级别第3级,高于第4级的正兵团级。按政务院1952年3月颁发的军队干部津贴费标准排列,军队级别第2级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为2等1级,第3级的军委委员级为2等2级,在此,军委委员级实际相当于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级。但是,军队级别不称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级,而称军委委员级,顾名思义,显然与1949年10月组成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项职务——委员[军委委员]有关。军委委员级对应的职务是大军区副司令、副政治委员,但是,只有担任军委委员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才可评为军委委员级。因此,1952年上半年时的军委委员如果评定军队级别,其职务为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者评为军委委员级,低于此职者才评为军委委员级,高于此职者则评为高于军

委委员级的其他级别，如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非军委委员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按《幅度》规定可评为正兵团级，只有个别资深的非军委委员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才得评为军委委员级。1955年1月，军队级别的两个等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军委委员级合并为一个等级——大军区级，军委委员级取消。依《幅度》规定，大军区、兵团及与之相当的编制机构担任上述职务者的军队级别一般评为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这种标准虽界定了范围、上限、下限，但仍显笼统、含混。

评定军队级别的结果显示，评正兵团级的有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评副兵团级的有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长、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由此可见，同级职务者的军队级别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因而，津贴费（薪金）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同职不同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等职对应的军队级别幅度较宽——军委委员级、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正军级，多达5个级别；个别人高于标准上限或低于标准下限；某些担任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二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职务的人，其职务等级须参照此前在野战军担任的兵团职务和任职时间；各大军区干部军队级别的差异（当时，大军区对确定个人军队级别起主导性作用）；德才资因素；等等。

通常，人们称某任兵团司令员是兵团级干部，这里

所说的级实际是职务等级。1952年，人民解放军全军评定了军队级别，级的含义有了变化，若以此精确而论，兵团级仅指部队级别，兵团职则指职务等级。由此，干部（军官）的等级产生两种概念：一是职务等级的概念，如兵团职（包括正兵团职，如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兵团职，如兵团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二是军队级别的概念，如兵团级（包括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正、副兵团职者的军队级别可能是正兵团级，也可能是副兵团级、准兵团级……这就是由职务等级、军队级别组成的军队干部等级的双重结构。后来，又以这种复杂的双重结构为基准评定军衔，使得职务、军队级别、军衔（职级衔）三者之间的关系愈加迷离。

1952年11月，总干部部（总干部管理部1952年7月改称）拟定了实行军衔制度的初步计划，设置了军衔等级——元帅、将官、校官、尉官、军士、士兵，共6等20级，其中将官设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1953年1月，军委颁发《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出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后因故推迟）；当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设置将官等级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军衔指示》，指出以军队级别为主要依据，参照编制军衔确定军官军衔；2月，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服役条例》，规定了授予军官军衔的条件；5月，国防部颁布《编制军衔》。人民解放军官兵遵此评定军衔。

《军衔指示》规定，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服役条例》规定的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的服务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等授予条例同样

适用于上将军衔；《编制军衔》规定，兵团司令员的基准职务军衔为上将，兵团副司令员的军衔亦可为上将。由此可见，上将军衔所对应的军队级别是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基准级别是正兵团级。1952年评定军队级别时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或与之相当职务者）被评为正兵团级、副兵团级者，1955年评衔时，符合上将军衔的评定标准。

不管评定军衔的标准、过程如何，1955年9月，55名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度的第一批上将。

由于《军衔指示》、《服役条例》强调授衔是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政治品德、资历、功绩是授衔的重要条件，因此，授予上将军衔（其他军衔亦然），除以军队级别作为主要依据外，还要考虑诸如革命经历的历史渊源、政治表现、战功、资历等因素，以及某些特殊情况，某种特殊人物，综合衡量，整体协调。55名上将就是这样性质的评衔、授衔的一项最终成果。时至今日，有关55名上将的资料、统计数字愈来愈清晰，人们可以从不同侧面，不厌其详地端量他们了。

1、上将人数（55人），占1955年9月授衔将官人数（1038人）的5.3%。

2、将官中的大将、中将、少将的军队级别除兵团级外，还有其他等级（大军区级、军级、师级），唯有上将的军队级别仅有兵团级一个等级。其中正兵团级33名，占上将人数的60%，占正兵团级人数的91.6%；副兵团级19名，占上将人数的34.6%，占副兵团级人数的45.2%；准兵团级1名，占上将人数的1.8%，占准兵团

级人数的 1.75% ;无军队级别者 2 名 ,占上将人数的 3.6 %。正兵团级的大多数 (91.6%) 授上将军衔 , 但只占上将人数的 60% (三分之二弱), 并非大多数上将的军队级别是正兵团级 ;副兵团级的近半数 45.2% 亦授上将军衔 , 占上将人数的 34.6% (三分之一强), 并非个别的副兵团级者授上将军衔。

3、革命经历的历史渊源 - - 原红一方面军干部 30 名 , 占 54.5% ; 原红二方面军干部 5 名 , 占 9.1% ; 原红四方面军干部 9 名 , 占 16.4% ; 原红 25 军干部 2 名 , 占 3.6% ; 原南方游击区干部 3 名 , 占 5.5% ; 原西北红军干部 1 名 , 占 1.8% ; 起义将领 3 名 , 占 5.5% ; 其他方面 2 名 , 占 3.6%。

4、中共第 7 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5 人 : 张宗逊、王震、吕正操、宋任穷、乌兰夫。

5、按照《军衔指示》、《服役条例》、《编制军衔》的授衔条件、标准 , 有的人本应授予上将军衔 , 却授予了其他军衔 ; 有的人拟应授予其他军衔 , 却授予了上将军衔 ; 有的人无军队级别授予上将军衔 ; 有的人有军队级别且评军衔终未授衔。成为与上将军衔有关联的特殊人物 - -

王树声 , 正兵团级 , 大将 ;

许光达 , 正兵团级 , 大将 ;

徐立清 , 唯一一名正兵团级中将 ;

贺晋年 , 唯一一名副兵团级少将 ;

贺炳炎 , 唯一一名准兵团级上将 ;

乌兰夫 , 无军队级别 , 授上将军衔 ;

闫红彦 , 无军队级别 , 授上将军衔 ;

李聚奎 , 原评军队级别、军衔 , 当时未授 , 后至 195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北京动物园正式命名

提起北京动物园，几乎尽人皆知，然而若说起三贝子花园、万牲园、中央农事试验场，则除了“老北京”较为熟悉外，年轻人和外地人恐怕会感到茫然的。其实，这几个称谓都指的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于1955年4月10日正式命名为北京动物园。

明代时，北京西直门外通往西苑的路上有一片皇家庄园。清康熙时，此庄名为“福安庄”，嘉庆年间，又改名为“乐善园”，该园西侧为满族贵族固山贝子祖先留下来的一片园林，名曰“三贝子花园”。当时满族的贵族称为“贝勒”，即后来的亲王、郡王。“贝勒”之子得封后，便封为“贝子”。三贝子花园便是清代某郡王的三子福康安贝子的私人园邸。三贝子花园几易其主，于光绪五年时为清廷所收，并入“乐善园”。光绪二十几年时，慈禧曾拨银数百万两修整了三贝子花园，取名“环溪别墅”。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园林遭到了野蛮的破坏。光绪三十年间，一些大臣们为讨好慈禧，从国外买回老虎、狮子、斑马等动物。此时，恰逢农工商部在三贝子花园中搞农事试验，于是买来的这些动物被放在园内“万牲园”因此得名，这便是北京最早的动物园。1908年，即光绪三十四年，万牲园开始对外售票营业。由于园内兼搞农业试验，故又改名“中央农业试验场”。当时，园内展出动物的地方非常小，动物的种类也不多。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军阀混战，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万牲园的景况一年不如一年。由于经费日益减

少，加上贪官污吏的层层克扣，致使园内动物因饥饿大量死亡，游人也越来越少。到北京解放时，园内仅存有驼鸟等极少量的动物。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对万牲园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使该园面貌焕然一新。1955年4月10日，这里被正式命名为北京动物园，成为全国开放最早的动物园。现在北京动物园已经成了游览观赏的胜地、获得知识的场所。许多国家赠给我国的礼品动物也在这里展览，成为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象征。此外，北京动物园还是动物科学爱好者的研究基地。

本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作了报告。

目录

- 一、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概要
-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
 - (一) 关于工业和运输业的基本建设问题
 - (二) 关于工业的生产问题
 - (三) 关于农业的增产问题
 - (四)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 (五) 关于保证市场的稳定问题
 - (六) 关于培养建设干部问题
 - (七) 关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问题

(八) 关于厉行节约问题

(九) 关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同我国建设的关系

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议案，我现在代表国务院向本次大会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编制完成的。一九五五年三月间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党的中央委员会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把这个计划草案提交国务院。国务院会议对这个五年计划草案加以讨论并一致通过，现在请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予以审议和通过。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的基础上开始实行的。全国解放之前，我国国民经济受到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掠夺和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人民的大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把原来由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垄断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和铁路等经济命脉变成全民的财产，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变成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就使我国人民有可能来迅速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三年中间，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战线上的高度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依靠全国人民在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进行“三反”“五反”等各个战线上的胜利，依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的经济政策的领导，同时还由于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援，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即我国结束经济恢复阶段的这一年，我国工业农业总产值（包括工业、手工业、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全部产值，这种产值都是按一九五二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下同），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其中：现代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七十八点六，农业（包括农村副业）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五。一九五二年，工业和农业的主要产品的产量，除个别的以外，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由于现代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快，它的产值在工业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十七上升到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在工业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同时，运输和邮电有了相应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平衡财政收支和稳定物价这些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对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人民生活改善，起了显著的作用。

在恢复时期中，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社会主义经济成份逐步地加强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在这个时期，公私工业都有发展，但国营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私营工业，私营工业中的一部分已经转变为公私合营，因而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合作化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七上升到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六十一，而私营工业

的产值所占的比重，则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三下降为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九。同时期内，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初步的发展。一九五二年，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在国内商业批发中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六十三，在社会零售中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三十四，对外贸易已由国家管制。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随着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已经在恢复时期大大地加强起来，因而也就大大地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开辟了道路，并需要我们着手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

苏联的真诚的、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是我国能够迅速地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帮助我国设计新企业和供应我国建设所需的设备，以及对我国的其他一系列的援助，表现了最伟大的和最崇高的国际主义。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期间是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这个计划草案的编制工作，在一九五一年就已经开始，中间经过多次的补充和修正，到一九五五年二月，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两年之后，才编制完毕。这是由于我国资源缺乏调查，统计资料也很少，有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我们又没有编制长期计划的经验，建设工作的经验又很不够。而且，从国家的整个情况来说，一九五一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到一九五三年七月底才实现了停战。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单位中的主要部分——第二批九十一个单位，

也到一九五三年五月才确定。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过去两年，只能一面进行建设，一面编制长期计划。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国在一九五二年已经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已经能够每年编制和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第一批五十个单位，早在一九五二年就已经确定并陆续施工，所以我们在建设方面并没有丧失时间。而且正因为我们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在执行两个年度计划的过程中又取得了不少的经验，这就使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加接近实际，更加能够保证它的胜利完成。

现在，我谨对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如下的说明。

一、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九五二年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亦即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制定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无论在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都不是一下子可以建成的，无产阶级在推翻了反动统治、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都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

取得政权之后，必须利用自己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来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要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就不仅要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而且要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转移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把包括多种经济成份的国民经济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九五四年已经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接受，列入了我国的宪法，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宪法序言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宪法第四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而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两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

大工业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列宁一再地指示说：“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没有大工业我们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来改造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

大家知道：我国曾经是一个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

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经济是很落后的。在解放前，我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重，而且主要是一些轻工业，这些轻工业很多还是依赖于外国进口原料的加工工业，至于重工业的基础则更加薄弱，虽然也有某些重工业，大多只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机械修理厂，或者只是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我国这种因为缺乏重工业的基础而造成的国民经济十分落后的状况，使我国百余年来国弱民穷，受尽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二十多年，极大地加深了我国这种落后的状况。他们只顾穷凶极恶地掠夺人民，没有建立起什么工业。他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曾经大肆吹嘘要建立一个什么年产十万吨的钢铁厂，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他们的家族越来越惊人地富了，但是结果连一个这样小规模钢铁厂也建立不起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全国除东北外每年只生产钢四万吨左右，而且都是满清末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代所建立的钢铁厂的产品。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为了掠夺资源，扩大侵略战争，曾经在那里扩建了一些钢铁工业，那些当然是附属于日本本国工业系统的纯粹殖民地式的工业，而且许多工厂和矿山在以后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所严重地破坏了。事实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一九四五年“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的：“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全国解放以后，人民掌握了政权，这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新中国出现了，一个工业化的新中国也就在望。这样的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长期流血斗争得来的，因此，国家工业

化的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才能克服我国现在先进的政权和落后的经济之间的矛盾，而把贫弱的中国变成真正富强的中国。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即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等等，我们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各种工业设备，使重工业本身和轻工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供给农业以足够的肥料，使农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生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头、汽车、轮船、飞机等等，使运输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也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来装备保卫祖国的战士，使国防更加巩固。同时，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增加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由此可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是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政策，实行这个政策，将为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有人认为：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于苏联革命胜利后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何必急于工业化呢？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在国内面对着国民经济的落后状态，在国外还有凶恶的帝国主义的包围，不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仅不能使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有使我国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保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的危险。由此可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国民经济，是

中国人民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的帮助，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有利条件，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只应该更加努力建设，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斗争。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解决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业经济和集体大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农业从分散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转变为集体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在集体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同时也要求个体手工业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广大的农民要最后摆脱贫穷和痛苦，也必须离开过去长期所走惯了的小生产的旧道路，而转向集体化和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新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对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根据宪法第八、第九两条规定，鼓励个体农民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鼓励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有人认为：中国农民在改革土地制度以后，已经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很高，何必实行合作化呢？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这还只是农民解放的第一步，因为他们仍然分散地耕种着小块土地，不能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就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抵御自然灾害，也就不能避免城乡资本主义的剥削，当然更不用说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意外的事故了。只有使农业和手工业从个体经营逐步地转变为集体经营，并在这个基础上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时候，才能大大地发展农业的生产力，扩大农业的再生产，提高生产量，以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要求，也才能限制以至消灭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永远摆脱贫穷和痛苦，而得到普遍富裕的生活。

建设社会主义，当然必须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妨碍着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互相对立的。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实现计划领导，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显著和尖锐起来。因此，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根据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有人希望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长时期地在同一个国家里并存，希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或者现在还不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认为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不走社会主义的路，就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而后面这条路，是中国人民所决不许可的。走社会主义的路，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我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的具体条件下，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使之逐步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已经由过去五年的实际经验所证明。

上述种种，说明我国为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积极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是不是说，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我们可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全部完成呢？不是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应该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看做是一个历史时期。我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有一亿一千多万农户的小农经济，有很大数量的手工业，而且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很艰巨很繁重，也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完成这个过渡时期的总任务，除了恢复时期的三年以外，大概还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即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正如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经过十五年左右紧张工作和刻苦建设，可能在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譬如说，要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都应该按照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逐步地实现。在工业建设中，必须根据资金和技术力量的可能，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来进行建设，那种不分轻重缓急，认为要建设就应该处处大规模和样样现代化，这种想法和做法，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有害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重工业企业，一般都要有五年左右的时间，要进行一系列的繁重的工作，要有各个方面的配合；我们要建设起很多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工业企业，才能达到工业化，哪能

希望在一个短时期内，不费什么力气就建设成功呢？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轻易完成，这是关系到几万万农民和成千万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革的大事情，要使劳动农民和手工业者彻底摆脱个体的小生产的道路，而转向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发展大道，这就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艰苦工作，通过一些必要的过渡形式，才能逐步地完成。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不仅需要整个经济发展能够帮助农业和手工业，也不仅需要农民和手工业者有文化知识，而且还需要有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亲身经验，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样也应该通过一些必要的过渡形式逐步地完成。

我们已经赢得了一个新中国，我们必须加紧努力进行经济建设来保护和巩固这个新中国，这个建设主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曾经对俄国人民指出：“或是灭亡，或是把本身命运信托于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地和最急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在中国，问题也是这样。毛泽东主席在解放前说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我们不能只是依靠落后的小农经济过生活，我们也必须抛弃使广大群众倾家荡产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要避免在自己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危险，只有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并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地改造我国的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过渡时期，我们就是要解决这种任务，而根据我们在恢复时期和五年计划前两年所已取得的成就，我们是有充分信心来解决这样的任务的。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概要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基点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大的步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规模是很大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七百六十六亿四千万，折合黄金七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的过去历史上，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政府，才可能来这样做。

在五年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中，属于基本建设投资的是四百二十七亿四千万，占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八。其他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二，即三百三十九亿元；一部分用于基本建设所需要的资源勘探、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和器材储备等；一部分用于发展工业生产和运输交通，如设备大修理、技术组织措施、新种类产品试制、零星固定资产购置等；一部分是各经济部门的流动资金；再有一部分是经济和文化教育各部门的事业用费和培养专业干部用费。

五年基本建设的投资四百二十七亿四千万元，是这样分配的：

工业部门为二百四十八亿五千万元，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二；

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门为三十二亿六千万元，占百分之七点六；

运输和邮电部门为八十二亿一千万元，占百分之十九点二；

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部门为十二亿八千万元，占百分之三；

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为三十亿八千万元，占百分之七点二；

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为十六亿元，占百分之三点七；

其他为四亿六千万元，占百分之一点一。

从上列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比例可以看出，投资的重点是工业。同样可以看出，投资的分配也已照顾到工业以外的其他各部门事业发展的需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方面国家投资的比例不算大，这是因为五年内农业还不可能广泛地实现机械化，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林业建设也还不可能全面展开；同时，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并没有包括农村救灾费、农业贷款等项，更没有包括农民自己投入生产的资金。如果把这几笔钱都算进去，则五年内为发展农业的资金总数将接近于工业的投资数字。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运输方面的投资比例也不算大，但在基本上可以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的需要。

五年内我国工业基本建设的新建和改建的单位，包括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个单位在内，在限额

以上（注）的有六百九十四，加上农业、林业、水利方面的二百五十二个，运输交通和邮电方面的二百二十个，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一百五十六个，城市公用事业方面的一百十八个，其他方面的一百六十个，全部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单位共有一千六百个。除了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单位以外，还有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六千多个，其中工业方面约有二千三百个。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能够在五年内建设完成的，工业方面有四百五十五个，加上其他方面共有一千二百七十一；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绝大多数可以完成。这些建设单位的完成，就将大大地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力，推动农业的发展，增长运输能力，扩大文化教育事业。

（注）国家为着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单位，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凡一个建设单位，不论其为新建、改建或恢复，它的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者，即是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小于限额者，即是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例如，在工业中，各类工业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规定如下：钢铁工业、汽车制造工业、拖拉机制造工业、船舶制造工业、机车车辆制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一千万元；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的投资限额为六百万元；电站、输电线路和变电所、煤炭采掘工业、石油开采工业、石油加工工业、除交通机械以外的机器制造工业、汽车和船舶的修配工业、纺织（包括印染）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五百万元；橡胶工业、造纸工业、造糖工业、卷烟工业、医药工业的投资限额为四百万元；陶瓷工业、除制糖以外的食品工业、其他各项轻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三百万元。

以工业说，包括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在内，其主要工业品的建设规模和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的数字如下列：

铁：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五百七十五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二百八十万吨。

钢：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六百一十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二百五十三万吨。

电：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发电能力将为四百零六万千瓦，五年内增加的发电能力为二百零五万千瓦。

原煤：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九千三百一十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五千三百八十五万吨。

冶金机械和矿山机械：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十九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七万吨。

发电设备：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八十万千瓦，五年内建成。

汽车：全部建成后的年产能力将为九万辆，五年内达到的年产能力为三万辆。

拖拉机：全部建成后的年产能力将为一万五千辆，一九五九年建成。

化学肥料：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九十一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二十八万吨。

水泥：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三百六十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二百三十六万吨。

棉纺锭：全部建成后增加的纺锭将为一百八十九万枚，五年内投入生产的纺锭为一百六十五万枚。

机制纸：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十八万六千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九万五千吨。

机制糖：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五十六万

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四十二万八千吨。

以运输业说，五年内新建成的铁路干线和支线共四千公里以上，加上恢复铁路、改建铁路、新建复线、延长车站站线、工业和其他的专用线，则增加的铁路总长度约为一万公里。五年内修建公路一万公里以上，新增加的通车里程为七千一百公里以上。五年内新增轮船四十万载重吨。

以农业和水利说，五年内将新建国营机械化农场九十一个，拖拉机站一百九十四。五年内除建设十三个大型水库外，修浚河道的土石方工程就有十三亿立方公尺，并将开始进行黄河的治本工程。

五年内，包括工厂厂房、工人职员宿舍、学校、医院等在内的房屋建筑面积，约有一亿五千万平方公尺。

工业建设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而在苏联援助下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单位的建设，又是工业建设的中心。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单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施工的是一百四十五个单位，其他十一个单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勘察和设计，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施工。这些工业建设单位，规模大，技术新，许多是我国工业史上完全崭新的创举。例如：

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在原有生产规模的基础上，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〇年这八年时间内，将基本上完成以下四十八个主要工程的改建和新建：三个铁矿，八个选矿厂和烧结厂，六座自动化的炼铁高炉，三个新式的炼钢厂，十六个轧钢厂，十座炼焦炉，二个耐火材料车间。这些厂矿和车间的改建和新建，都将尽可能地利用苏联最新的技术成就。这个我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在改

建完成以后，它的生产规模可以扩大到年产生铁二百五十万吨，钢三百二十二万吨，钢材二百四十八万吨。它所生产的各种规格的钢材、钢板和钢管，可以基本上供应国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制造火车头、轮船、汽车、拖拉机等等的需要；它所生产的各种规格的钢轨，每年可以用来铺设三千多公里的铁路。

在改建鞍山钢铁联合企业的同时，将进行武汉和包头两个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

五年内进行建设的电站，发电能力在五万千瓦以上的火力发电站就有十五个；丰满水电站在改建完成后，发电能力可以达到五十六万千瓦以上。这些建设单位的完成，将大大地加强各地区的电力供应能力。

五年内进行建设的煤矿企业，设计能力（包括原有的生产能力在内）在年产煤一百万吨以上的就有三十一一个。其中五个最大的煤矿企业在一九五七年将达到的年产能力如下：抚顺矿务局所属煤矿为九百三十万吨，阜新矿务局所属煤矿为八百四十五万吨，开滦煤矿为九百六十八万吨，大同矿务局所属煤矿为六百四十五万吨，淮南矿务局所属煤矿为六百八十五万吨。

五年内建设并完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它发挥了生产能力以后，每年能够出产载重汽车三万辆，供应运输业的需要。设计能力比第一汽车制造厂大一倍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也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这两个汽车制造厂将为我国建立汽车制造工业的基础。

五年内开始建设的拖拉机制造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完成后，我国将能够每年出产五十四匹马力的拖拉机一万五千台，供应农业的需要。

五年内开始建设的二个重型机器制造厂（其中一个

是苏联帮助设计的，一个是我国自己设计的)，在建设完成后，按照设计能力，它们的产品每年可以装备一个年产一百六十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供应炼铁、炼钢、轧钢和炼焦的全套设备。

五年内开始建设的制造发电设备的工厂，在它们全部建设完成后，我国就能够制造每台容量一万二千千瓦、二万五千千瓦以至五万千瓦的发电设备，供应国民经济各部门建设电站的需要。

我国许多轻工业工厂是由国内自己设计和建设的，许多工厂的规模也是相当巨大的。例如在我国首都北京建设的三个棉纺织厂，共装备纺锭二十三万枚，织机七千多台。五年内进行建设的规模较大的纺织厂，共有三十九个。

不只是许多工业建设单位的规模是很巨大的，许多铁路、公路、水利等等的建设单位的规模也是很巨大的。例如：

五年内进行建设的贯通甘肃和新疆的兰新铁路，贯通西北和西南的宝鸡到成都的铁路，贯通江西和福建的鹰潭到厦门的铁路，连结我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的集宁到二连的铁路，不仅线路很长，而且它们或者要经过沙漠地带，或者要穿过高山峻岭，建设工程都是很浩大的。

五年内继续进行建设并已在一九五四年通车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全长共有四千三百多公里，它们都是在人烟稀少的海拔几千公尺的高山上开拓出来的，建设工程是特别艰巨的。

五年内继续进行建设的淮河根治工程，计划建成南湾、薄山、佛子岭、梅山等四个大型水库，共可蓄水三

十八亿立方公尺以上；同时对洪河、汝河、濉河、北淝河等主要支流进行防洪排涝工程。在一九五四年已经建设完成的官厅水库，可蓄水二十三亿立方公尺，对免除永定河下游的水患将起重大的作用。

五年内将开始进行黄河的根治和综合开发工作。黄河全长四千八百多公里，流经七省，流域面积七十四万五千平方公里，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就是为害最严重的河道。根据黄河的综合利用的规划方案，在黄河中下游及其主要支流将修建水坝几十座，在三门峡等五处将建设足以调节流量的巨大水库，并建设巨大的水力发电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黄河的根治和综合开发工作将完成流域规划，并开始建设三门峡的水利、水力枢纽工程。

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建设的国营友谊农场，将开垦荒地三十七万五千亩。这个农场拥有由苏联赠送的大批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它将在我国今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道路上起重要的示范和带头的作用。

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五年内我国将开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设，使之成为国民经济服务。

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已经足以说明，我们正在做着为全国人民和后世子孙谋幸福的大事。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工业建设和其他建设的任务，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从而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无疑将起极其重大的作用。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代表着中国人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和最高的利益。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原有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的发挥，加上新建和改建的工业企业投入生产，将使我国工业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现代

工业在工业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六。

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九十八点三，即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四点七。其中，现代工业增长百分之一百零四点一，即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点三。我国这种工业发展速度，无疑是比较高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五年内，我国各种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将有显著的增长，主要产品在一九五七年的计划产量比一九五二年的产量增长的情况如下列：

钢：从一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四百二十万吨，增长二点一倍。

发电量：从七十二亿六千万度增加到一百五十九亿度，增长一点二倍。

原煤：从六千三百五十三万吨增加到一亿一千三百万吨，增长零点八倍。

发电机：从三万千瓦增加到二十二万七千千瓦，增长六点七倍。

电动机：从六十四万千瓦增加到一百零五万千瓦，增长零点六倍。

载重汽车：达到四千辆（一九五二年还不能制造）。

水泥：从二百八十六万吨增加到六百万吨，增长一点一倍。

机制纸：从三十七万吨增加到六十五万吨，增长零点八倍。

棉布：从一亿一千一百六十三万匹增加到一亿六千三百七十二万匹，增长零点五倍。

机制糖：从二十四万九千吨增加到六十八万六千吨，

增长一点八倍。

或者有人认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钢的产量仍然不过四百多万吨，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 and 英国，而且也落后于日本，这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这样的地位相称吗？我们认为：这只看到事情的一面，没有看到事情的另一面。美国、英国、日本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工业发展的历史已有一两百年，少的也将近一百年，我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比它们落后了一百多年，或者几十年，仅仅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才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建设。我国在一九

七年，才建设起一个汉阳钢铁厂，当年的钢产量只有八千五百多吨。到一九三三年，全国钢产量也只有二万五千吨。一九三六年全国钢产量超过四十万吨，但其中三十六万四千吨是由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下的东北生产的。我国历史上钢铁生产的最高年份是一九四三年，出产生铁一百八十万吨，钢九十万吨，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日本侵占下的东北。由于蒋介石反动派的破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年，即一九四九年，全国生铁产量只有二十四万六千吨，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多吨。由此可见，我们承受的是旧中国极其可怜的遗产。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把改变中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艰巨任务担当起来，在短短三年时间内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有一些发展，接着又将在五年时间内使工业生产提高一倍。我们没有“封神榜”上那种呼风唤雨的本领，哪能用五年时间就赶上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曾经说过：“决不可把工业发展速度和工业发展水平混为一谈”。我们工业发展的速度将是很快的，可是就工业发展的水平来说，在相当时期内，

我们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将还是落后的，因此，我们必须赶上去。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赶上它们，或者赶上它们的工业水平，并不需要一百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够了。我们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就赶上中国反动统治时代的几十年，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难道还慢吗？

我国要实现的国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以苏联为榜样并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直接帮助下的工业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所以我国工业——特别是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就能够有很高速度的发展。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八十八点八；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十一点二。同时，按照计划，五年内生产资料的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六点五，消费资料的产值则增长百分之七十九点七，因此，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将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七到一九五七年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五点四，消费资料的产值所占的比重，将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六十点三到一九五七年下降为百分之五十四点六。

社会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增长的比例的变化，也表现着我国工业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特点。五年内国营工业的产值增长将为百分之一百三十点一；合作社营工业和五年计划前已有的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私营工业的产值在五年内将有一半要转变为公私合营。因此，到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营（包括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加工工厂，不包括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的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将上升为百分之八十七点八，私营工业产

值所占的比重将下降为百分之十二点二，而且其中的主要部分将接受国家的加工定货，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农业规定了适当的增产指标。五年内，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即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三。

按照计划，主要农业产品一九五七年的计划产量及其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的情况如下列：

粮食：达到三千八百五十六亿斤，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六。

棉花：达到三千二百七十万担，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四。

黄麻、洋麻：达到七百三十万担，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七。

烤烟：达到七百八十万担，增长百分之七十六点六。

甘蔗：达到二百六十三亿斤，增长百分之八十五点一。

甜菜：达到四十二亿七千万斤，增长百分之三百四十六点四。

油料作物：以播种面积计算达到一亿一千八百万亩，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八。

克服农业的发展过分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矛盾，是五年计划的一个重大任务。我国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农业生产不仅没有发展，相反地还受了严重的破坏。一九三六年的粮食产量是三千亿斤，此后差不多年年下降，到一九四九年，粮食产量只有二千二百六十亿斤，棉花产量只有八百八十万担。解放以后，仅仅经过三年的时间，我国在一九五二年的粮食产量就达到三千二百七

十八亿斤，棉花产量达到二千六百万担，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五年农业计划又在一九五二年的基数上再提高到上列数量，这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农业发展的速度是不能算很低的，应该努力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增产的基础，也是改造小农经济的必由之路。到一九五七年，参加现有的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将达到三分之一左右。

适应于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对交通的需要，运输和邮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将有相应的发展。到一九五七年，铁路货物周转量将达到一千二百一十亿吨公里，即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一倍；旅客周转量将达到三百二十亿人公里，增长百分之五十九点五。内河轮驳船货物周转量将达到一百五十三亿吨公里，即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三点二倍；旅客周转量将达到三十四亿人公里，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七。沿海轮驳船货物周转量将达到五十七亿五千万吨海里，即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一点九倍；旅客周转量将达到二亿四千万人海里，增长将近一点四倍。公路汽车货物周转量将达到三十二亿吨公里，即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三点七倍；旅客周转量将达到五十七亿人公里，增长将近二倍。民用航空货物周转量将达到八百零五万吨公里，即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三倍。邮路总长度将达到一百九十七万公里，即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其他邮电业务，也将有相当的发展。

在上述工业农业发展以及各种比重变化的基础上，一九五七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达到四百九十八亿元左右，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八十左右。其中：国

营商业约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点二，合作社营商业约增长百分之二百三十九点五。原有私营商业在五年内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将有半数上下转变为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业，这两部分商业和私营商业的零售额合并计算，在五年内仍将有所增长。到一九五七年，在社会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将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九，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形式的小商业将占百分之二十四，私营商业将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一。

五年内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事业将有相当的发展。一九五七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较，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的数将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七，在一九五七年达到四十三万四千人；高级中学在校学生的数将增长百分之一百七十八，在一九五七年达到七十二万四千人；初级中学在校学生的数将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六，在一九五七年达到三百九十八万三千人；小学学生的数将增长百分之十八，在一九五七年达到六千零二十三万人，即占全国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五年内科学研究事业将有较大的发展，只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机构即将增加二十三所，研究人员将增加三千四百人。在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社会文化等方面，五年内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比较快的发展。

五年计划对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了适当的规定。五年内，就业人数共增加约四百二十万人，工人职员平均工资以货币计算约增长百分之三十三；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所支付的劳动保险基金、医药费、福利费和文化教育费将共达五十亿元以上；国家拨款为工人职员建筑的住宅，将约达四千六百万平方公尺。五年内，

农村人民的生活将逐步地得到改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购买力将增长近一倍。国家将拨付一定数量的款项，救济因受灾而在生产上和生活上发生困难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人民保健事业有较大的发展，五年内病床将增长百分之七十七，医师人数将增加百分之七十四，中医师的力量将被发挥。

谁都能够看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重大的变化。五年内，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将使我国的经济面貌开始发生变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初步的基础。五年内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将为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初步的基础。五年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将经过公私合营、加工定货、代销经销等方式而被逐步地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基础。这一切变化，无疑地将进一步地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地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并为进一步地改善我国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创造条件。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是关系着我国国家命运和人民幸福的大事情。可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使我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第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也将增强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

我国在胜利地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当然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切方面的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建设的许多重要的建设工程，有的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建成，有的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在生产上起重要的作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终结的时候，在工业方面，我国机器制造的能力和水平都还不可能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技术改造的需要，许多

大型和精密的机器设备还不能制造，某些工业部门如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还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同时，工业的地区分布，虽然在内地建设了不少新的工业企业，但还不能完全克服原来偏集于一方和沿海的不合理状态。在农业方面，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只在三分之一左右的农户中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还没有开始，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迅速发展的状况还不能完全改变。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只是实行了第一步，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把它们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在文化方面，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还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是不高的，并且还有相当大量的文盲存在。此外，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也还不可能完全消灭，剩余劳动力还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努力，加以解决。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工业和运输业的基本建设问题

现在我想就关于工业和运输业的基本建设的以下问题作一些说明。这些问题就是基本建设的规模的大小问题，轻重工业投资的比重问题，大中小型企业的配合问题，工业的地区分布问题，基本建设的标准问题，保证工程的质量问题。

第一，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在五年计划的编制过程中，我们曾经作过反复的考虑和多次的研究。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已经确定的建设规模是适当的，是五年内应当而且可以争取完成的。

有人怀疑过这样的建设规模是否过大。他们的理由

是：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在经济上很落后和很贫穷的国家，国家财力有限，技术力量不足，资源情况很多不明，在五年内进行这样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是不能胜任的。因此他们觉得可以把这个建设规模加以缩小。他们说不要搞得这样紧张，把任务减轻下来吧。他们又说“农民太苦”，慢一点搞工业化吧。我们不同意这样的主张。我们的理由正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摆脱我国在经济上很落后的地位，除了加速工业的建设以外，并没有别的出路。同时，我们工业化的建设，也正是为着使农民有可能摆脱贫穷的状况。五年计划已经确定的工业建设单位，都是必需的，如果削减，就将延缓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同时打乱国家的建设部署。

我们国家的财力是不是有可能来适应这样的建设规模呢？我们答复这是可能的。其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革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以下的积累来源：

一、我国人民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者已经不可能象过去那样掠夺我国人民的大量财富，这样就提供了我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积累来源。

二、我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变成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过去要向地主交纳高额的地租，现在不再交纳了，农民用劳动的所得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可以用其中的一部分帮助国家的建设。

三、我国人民推翻了官僚资本主义，把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变成了全民的财产，现在工人已经不为官僚资本家的利润而生产，而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这也是我国建设的重要积累来源。

四、在私营工厂做工的工人，现在虽然仍旧要拿出

一部分劳动成果作为资本家的利润，但是现在资本家只能得到法令所规定的适当的一部分利润。资本主义企业利润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或则缴纳所得税，投入国家的建设；或则变为企业公积金，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这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也是对于国家和人民有利的。

所有这些都证明：我国并不是没有建设资金，而是以前大量资金都装进了帝国主义者、地主、资产阶级的腰包，只有人民革命胜利以后，我国人民才有可能把自己劳动所创造的资金，用于国家建设，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创造美好的将来。我们应该及时地和好好地来利用这种资金。

说到技术力量不足和资源情况很多不明，这是不错的。可是难道我们不可以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之下一面建设一面学习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在建设中逐步地学会本领、逐步地摸清情况吗？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著作中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主席在这里说的是关于革命战争。可是要做好任何的人民事业，都是必须在实际中去学习，这却是普遍的真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在实际的建设中已经学会了不少事情，对于资源情况比以前也知道得多了。显然，等待并不能够增加我们的本领和知识。认为一切都必须“先学好了再干”，而因此主张削减五年建设的规模，打算减轻自己所应该担当并且能够担当的责任，这种主张是不能采取的。

那末，基本建设规模能不能够更加扩大呢？

按照我国的需要来说，无论是重工业、轻工业，无论是钢铁、有色金属、化学肥料、石油、机器、纺织等工业，五年计划草案规定的基本建设计划和生产计划，都还是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的。但是建设规模能否更加扩大，不但必须根据是否需要，而且必须根据是否可能。我们不是空想家，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所以认为五年计划建设规模是适当的，削减它是不应该的，这就是因为按照我国现在客观的条件，实现它是可能的。而且，我们认为：在年度计划中，还可能适当地扩大一些必要的建设，例如煤矿、石油、铁路等等，我们已经在准备这样做。特别是我国的石油工业的产量很低，同需要的程度相差很远，我们必须努力地去找寻更多的石油资源和研究发展人造石油工业的办法，以便把石油工业的建设规模加以扩大。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顾财政力量、技术力量和设备供应的各种可能的客观条件，而任意地、无限制地去扩大一切建设呢？当然，事情也不可以这样做。从财政力量方面说，五年内国家对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已经达到七百六十六亿四千万。从技术力量方面说，五年计划所已经规定建设的巨大的复杂的新企业都是苏联帮助设计的，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目前还缺乏条件来独立设计这样的新企业。从供应设备方面说，在我国机器制造工业目前还缺乏制造重要设备和复杂机件的能力的情况下，也难于增加很多设备的供应。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在五年内可能再扩大的建设，也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认为可以不顾可能的客观条件而无限制地扩大建设的规模，或者不注意最合理地和最有效地利用物力、人力和财力，而无把握地去处处动手，这些都是错误的。

反对右的保守主义，也反对“左”的冒险主义。这就是我们关于基本建设规模大小问题的结论。

第二，轻重工业投资的比重问题。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而且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还要大。前面说过，在五年内的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八十八点八，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十一点二。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九，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十四点一。我国重工业投资占这样大的比重，而轻工业投资占较小的比重，这是否适当呢？是否可以减少重工业的投资，增加轻工业的投资呢？

大家知道，轻重工业的投资的比例关系，必须根据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来决定。而在每个发展时期中，这种比例关系的具体规定，又应该照顾到当时的具体条件。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原有的重工业的基础特别薄弱，需要我们积极地长期地去扩大重工业的基础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使用的潜在力量，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一方面许多轻工业品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就在于缺少原料。所以说，我国目前发展轻工业的问题，主要不是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增加原料生产的问题。在轻工业的一些原料还不能大量地增产以前，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是不能发挥投资效果的，因为原料供不上，即使工厂建成也不能开工生产。但如果农业丰收，轻工业原料有很大的增产，在现有的

轻工业设备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年度计划中考虑增加一些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因为轻工业工厂的建设比较容易，建设时间比较短，也就不致于拖延建设进度。

因此，我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的规定是适当的。

第三，大中小型企业的配合问题。

我们强调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是不是说就可以不注意或者放松中小厂矿的建设呢？毫无疑问，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那些大企业，象钢铁联合企业、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重型机器制造厂等等，都是我国工业化事业决不可少的工厂，没有这样一批巨大的、带有工业骨干性质的工厂，我们就无法实现工业化。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只要大企业，可以不要中小企业。相反的，中小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设完工和投入生产，能够迅速地发挥投资效果和增加生产能力，不但对于增加工业品的供应和支援农业的生产有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于资金积累的增加以及支援和配合重点工程的建设，也都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纠正两种错误的偏向：一种偏向是看不见全局，不区别轻重缓急，盲目地到处建设，从而妨碍重点工程的建设；而另一种偏向则是单纯地醉心于巨大企业的建设，轻视中小企业的建设，不适当地使国家资金过多集中在少数巨大企业的建设单位，以致不能迅速地发挥投资的效果。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工业建设的进行中适当地分配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投资，使大中小型的企业建设能够互相配合和互相协作，以达到既能保证必要的重点工程的建设、又能保证许多企业能够迅速地发挥投资效果

的目的。

第四，工业的地区分布问题。

我国原有工业的地区分布是很不合理的。据一九五二年的统计，沿海各省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逐步地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态，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使工业的分布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逐步地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这是有计划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五年基本建设计划，对地区的分布作了比较合理的部署，这就是：一方面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而特别是对于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进行必要的改建，以便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供应国民经济的需要，支援新工业地区的建设；另一方面则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根据这样的方针，五年内开始建设的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工业建设单位，分布在内地的将有四百七十二个，分布在沿海各地的将有二百二十二个。为着适合工业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着把原有工业基地和新工业基地连接起来，五年内关于铁路的建设也作了相应的部署。同时，根据这种工业部署的方针，我们现在关于城市建设的任务不是发展沿海的大城市，而是要在内地发展中小城市，并适当地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现在沿海城市有些盲目发展的毛病，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显然，五年计划草案规定的关于工业和铁路的基本

建设的地区分布，是符合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按照这个计划的部署，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我国就不但将加强东北的工业基地，而且还将有分布在华北、西北和华中各地区的一些新工业基地，这样也就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我国广大地区的经济生活。这种工业的地区分布是建立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的，因此也就开始改变了过去工业分布的性质。

第五，基本建设的标准问题。

不论是企业或城市的新建和改建，我们必须把生产性的建设和非生产性的建设这两种标准区别开来。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疏忽了这个区别，因而在许多非生产性的建设中犯了方针上的错误，使得许多非生产性的建设标准远远地脱离我国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脱离我国现在社会的生活水平，在许多地方不适当地建造起许多高楼大厦，而且有不少企业把那些可以从简的附属建设、工厂办公室、职工宿舍、食堂等也都建成现代化的，甚至有的在新建厂矿还未有效地投入生产以前，一切福利设施如礼堂、俱乐部等等，不但都已建设齐全，而且还是采用了很高的标准。不少新工业区的城市建设也标准过高，过早地要求现代化，过份地讲究街道市容。所有这些，也就浪费了资金，浪费了人力和物力，违反了重点建设的方针。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指示，我们正在改正这个错误。我们区别的标准是这样：许多限额以上的、特别是属于重点建设的厂矿，必须力求采用最新的技术，厂房也要尽可能地适合最新技术设备的要求；至于其他非生产性的建设标准则一律都要大大降低下来，城市规划的标准也要降低。区别了这两种标准，就使我们有可能节省那些

不应有的和可以节省的支出，而用于增加生产性的建设，来加速我国建设的速度。这是有关我们国家建设长远利益的一个重大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国家机关和一切企业部门都必须遵守这个决定，不能违反这个决定。我在下面说明节约问题的时候，还将联系到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第六，保证工程的质量问题。

上面我所说的关于工业和运输业的基本建设的几个问题，是属于方针上的问题。当然，只有正确的方针是不够的，有了正确的方针之后，重要的是必须把工作做好。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还很低，而且为着争取时间，我们有些建设工程不得不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并在建设的过程中来试制各种机器设备，因此，某些工程就存在着质量差、进度慢、浪费多等严重缺点，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去克服这些缺点，特别重要的是要保证工程的质量。应该看到新建厂矿、铁路的工程质量的好坏，对于这些厂矿、铁路在长时期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后果。国民党统治时期所筑的宝鸡—天水铁路，因为工程质量极端低劣，如果今后不加改建，就不能改变这条铁路一年中许多日子处于瘫痪的状态。过去几年，我们曾经修复了许多厂矿、铁路，但是必须看到修复原有厂矿、铁路是一回事，新建厂矿、铁路是另一回事，决不可以把新建看成修复那样简单。因此，今后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以求保证工程的质量：

- 一、提高设计工作，在设计人员中确立正确的设计思想和负责的工作态度，力求避免在设计中造成差错；
- 二、加强施工的技术指导，严格地按照设计文件的

要求进行施工，同时积极地推广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中的先进施工经验，鼓励合理化建议；

三、各有关方面必须认真地协同地工作，保证基本建设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能够合乎设计的标准，并及时地供应；

四、国家机关和基本建设主管部门经常对工程的质量进行切实的检查。

（二）关于工业的生产问题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九十八点三，即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四点七。这个速度比起恢复时期要低，但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条件说来，这个速度是高的，是带有积极性质的。

建设时期和恢复时期的情况不同，建设时期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低于恢复时期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这是自然的。原因是：旧企业生产的恢复比较容易，新企业的建设和新技术的利用比较困难，而且工业产值的基数又一年一年地增加。虽然是这样，但根据我国现有工业设备的生产潜力，五年内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是可能更高些。如果我们努力设法去克服困难，那末我们就不但能够完成计划，并且有可能超额完成计划。

五年内工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主要地依靠我国原有的企业。按照全国的工业总产值大体计算，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新增加的产值中约有百分之七十左右为原有企业所增产，由新建和重大改建的企业增产的还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原有企业除供应新建企业以设备、材料和满足人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外，还担负着为国家积累资金和培养干部等重大任务。因此，除了新建和扩建的企业应该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争取提早投入生产

外，必须重视现有企业的生产工作，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争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只顾建设新的厂矿，不重视利用原有的厂矿，不设法发挥原有厂矿的生产能力，这显然是很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我国的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在供应城乡人民的生产需要和生活需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过去几年中，由于计划工作方面的缺点和其他原因，地方工业的某些行业曾经发生过盲目发展的毛病，使全国工业生产的安排增加了一些困难。但总的说来，地方工业的积极发展是正确的。今后应该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贯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继续正确地发挥地方工业的作用，发挥手工业的作用。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对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因而不去积极地有计划地领导和帮助地方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显然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生产指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增产和节约工业原料，试制新种类产品，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水平。我现在就这三个问题作如下的说明。

第一，增产和节约工业原料问题。

五年内增加工业品产量的一个困难是工业原料不够。我在前面说到轻重工业投资比重问题的时候已经提出这点。所谓原料不够，首先是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不够，这就是棉花、麻、油料、烟叶、甘蔗等等原料增长的数量暂时将还低于工业生产增长的要求。其次是来自重工业的原料不够，这些原料有的是产量还少，有的是目前国内还不能生产。当然，有些原料是可以争取进口的，

但是由于农业土产品的增产不够，或者国内消耗过多，使土产品的出口数量不够，减少了外汇收入，因而也减少了工业原料的进口。

为着克服工业原料不足的困难，我们必须增加棉花、黄麻、洋麻、烤烟、甘蔗、甜菜、花生、芝麻、油菜子等工业原料的产量。五年计划规定的关于扩大上述各种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的指标，必须保证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同时，这些技术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必须尽可能地提高。以棉花来说，五年内扩大播种面积一千一百多万亩，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因为主要产区大部是老解放区，只要在这些地区对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给以特别的注意，国家对于棉农尽可能地加以援助，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可能的。以烟叶和甘蔗来说，五年内扩大烟叶的播种面积一百多万亩，扩大甘蔗的播种面积一百多万亩，也是能够实现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扩大粮食的播种面积，另一方面要力求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条件下，多增加一些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多种五十万亩烟叶，就能增产五十万箱纸烟；多种四十万亩甘蔗，就能增产十万吨食糖。以油料作物来说，如果广大农民群众都尽可能地利用空隙土地动手种植，五年内扩大播种面积三千二百多万亩的计划，是不但可以完成，而且可以超过的。

我们必须增加出口土产品的产量，以便换取外汇，增加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进口原料。只要各地方国家机关和全国农民加以重视，出口土产品的增产是完全可能的。

在工业原料问题上，我们除积极地增产以外，必须节约地使用原料，克服浪费。如果每件棉纱平均少用两斤棉花，全国每年就可以至少增产两万件棉纱。根据我

们最近得到的材料，上海市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第一季度，公私纺织厂每件纱的平均用棉量已降低到三百八十六点一斤，比全国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每件纱的计划用棉量降低将近七斤。其中国营棉纺织厂每件纱的平均用棉量为三百八十四点九八斤，公私合营棉纺织厂每件纱的平均用棉量为三百八十六点六五斤，私营棉纺织厂每件纱的平均用棉量为三百八十七点四二斤。这种节约用棉的先进经验，应该认真地在地推广。又如，只要每百斤油料平均多出一斤油，全国每年就可以至少增产一亿余斤食油。吉林省四平市李川江的“大豆榨油操作法”，使每百斤大豆的出油量在一九五四年提高到十三斤半，比全国每百斤大豆的平均出油量多二斤左右；李川江所在的榨油车间于一九五五年第一季度，每百斤大豆的出油量又提高到十四斤以上。这个先进的操作方法，全国各地都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推广。对于某些原料不足的工业品，我们还应该积极地研究某些代用材料，扩大原料的来源，来增加生产。

有许多产品，例如煤炭、磷肥、盐等，还有提高产量的潜力，只要我们加以组织，并给以必要的投资，那末，增加产量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试制新种类产品问题。

五年内增加工业品产量的另一个困难，是有一些企业由于技术水平低，能够制造的产品不适合需要，而有销路的产品一时还不会制造。

某些急需的东西一时不会制造，这是我国工业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国家的机械工业部门正在设法改进。但是新产品太少并不只是机械工业部门独有的现象。应当考查的是各级主管部门对于新产品的制造工作，

是否作了应有的努力？全国各个方面首先是各个工业部门是否已经把这件工作看成是共同工作而共同努力？我们以为，我们的努力还不够。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设计新产品，试制新产品，给新产品试制工作以充分热情的协助。有些市场需要的工业品，例如若干金属产品、若干机械产品、若干化学工业产品、若干医疗器械，我们不但有原料，也有自制的能力，仅仅因为没有去组织生产，所以没有制成。因此企业管理机关必须经常了解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制造适合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的产品。

必须了解，试制新产品这一工作的意义，决不只限于提高目前的工业生产，更重要的在于这是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必要途径，而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又是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的一个基本条件。

国家的经济工作部门，应该设立关于研究和试制新种类产品的领导机构，以便有系统地了解 and 收集国内外关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新种类产品的生产情况，加强关于新种类产品的计划、设计、试验和制造的工作，不断地总结新种类产品试制的经验，经常地检查新种类产品的试制计划，保证计划的实现。国家应该制定办法，奖励公私企业和手工业制造新种类产品，奖励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发明和创造，并鼓励公私企业注意利用他们的发明和创造，进行试制的工作。认真地注意新事物的出现，并对它们的生长给以热情的帮助，是我们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那种不重视新事物，对新事物丧失感觉的人，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增加新种类产品和工业品产量的一个重要关键，是加强企业内部、各个企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协同

合作。工业生产是互相联系和需要互相配合的，只有协同合作起来才能生产和增产。我国原有工业设备的零散和不相配合，要求我们更加广泛地协同合作，使企业的专业化同企业生产之间的协作进一步地结合起来，彻底地改变那种只在本企业或本部门范围内关起门来生产的想法和做法。不仅企业内部在生产上要协同合作，一个部门的各企业之间在生产上要协同合作，而且各部门之间在生产上也要协同合作。为了能够很好地协同合作，各个车间或工段、各个企业、各个部门都应该树立全局观点，克服局部观点。

有关企业同企业之间、部门同部门之间重大的协同合作的项目，应该分别地列入国家和部门的生产计划；同时，应该普遍地推行企业同企业之间的合同以及企业内部各车间的联系合同，使工业部门、各企业单位在生产中能够很好地相互配合和相互衔接，提高工业的组织程度。

第三，提高企业的管理工作水平问题。

几年来我们企业的管理工作是有很大改进的，因而全国每年都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但是，有不少的企业并没有完成计划，有的没有完成产值指标；有的只完成了产值指标，没有完成产品的种类和质量的指标；有的完成了产量和质量的指标，没有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指标。有不少的企业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存在着忽松忽紧和前松后紧的现象，生产很不均衡，增加了生产中的混乱。有不少的企业仍然经常发生伤亡事故和设备事故，造成损失。由于企业管理工作的缺点和水平不高，工业品中种类少、质量低、成本高等等现象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因此，一切工业企业，必须按照五

年计划草案第三章关于实现工业生产计划的必要措施的第六条规定，不断地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特别是加强技术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企业中的政治工作，使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互相结合，提高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政治觉悟，充分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们应该看到工业生产计划的完成，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的，那种对于完成工业生产指标满不在乎地认为“没有问题”的态度，是不对的。但是，只要全国劳动人民共同努力，增加工业生产，提高工业品的质量，完成和超额完成在五年内工业生产增加产值百分之九十八点三的计划指标是完全可能的。那种害怕困难、丧失信心的情绪，也是不对的。

（三）关于农业的增产问题

农业生产供应全国人民的食粮，同时，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工业产品，在目前又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进口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大部分也是农产品出口换来的。因此，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我们集中力量发展工业，但决不能够减轻发展农业的意义。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我们的工业化事业是不可能实现的。防止和克服农业同工业的脱节，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重大而又迫切的任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在五年内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到一九五七年达到五百九十六亿六千万元；以产量说，粮食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六，即增产五百七十八亿斤，到一九五七年达到三千八百五十六亿斤，棉花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即增产六百六

十万担，到一九五七年达到三千二百七十万担。上述指标，虽然已经比原来拟定的有所降低，但因为是以农产品丰收的一九五二年为基数，所以仍然是很高的；而且因为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两年的农业生产都由于灾荒没有完成原来拟定的增产计划，就增加了五年计划的后三年的增产任务。因此，要达到上述指标，还必须作很大的努力。

我现在要说的是关于农业的合作化、农业的增产措施、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这三个问题。

第一，农业的合作化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在自愿互利原则的基础上，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说，这还只是实现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这种初步的合作化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成几十户的联合经营，就有可能比较合理地组织劳动力和使用土地，就有可能积累资金，来增加农业的投资，使用改良农具，兴修水利，提高耕种技术，以及实现个体农民难于单独进行的种种其他增产措施。根据各地的许多材料看来，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初建的一、二年内，如果办得不坏，一般可以增产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往后还可以在每年保持某种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个体农民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按照目前情况来说，这是一种投资少、收效大、收效快的农业增产办法，又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步骤。经过这种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结合初步的技术改良，而后再逐渐地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化，结合农业机械化和其

他的技术改革，这是引导我国农业生产不断地进步的道路。

根据几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和各地方已经达到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参加现有的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东北各省和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及其他老解放区，合作化的规模都将达到农户半数左右。在技术作物地区和城市郊区，将努力地争取先一步合作化。这个农业合作化的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努力地争取实现。国家在财力物力上，将全力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我们的农业合作运动有很大的成就。过去几年组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巩固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它们的产量有显著的增加。但有些地方也有少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工作进行得较粗较急，发生了强迫命令的倾向和其他的缺点，这些毛病如不纠正，则非但不能增产，可能还要减产。我们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一面巩固，一面发展。在工作中，必须坚决地遵守群众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防止和纠正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损害中农利益的行为，并妥善地解决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各种问题，如劳动力的计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报酬、生产资金的筹集、公积金的比例等等问题。

在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仍然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各种具体形式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准备条件；仍然必须照顾单干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给单干农户以积极的帮助和领导，发挥他们生产的潜在力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第二，关于农业的增产措施，五年计划草案第四章已经写得很详细，现在我提出以下几点：

一、开垦宜于耕种的荒地。我国的人口很多，但已耕的土地还很少，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把宜于耕种的土地开垦起来，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农业生产的不足。五年计划规定扩大耕地面积三千八百六十八万亩，是最低的指标，必须尽可能地用各种办法超过这个数字。开垦荒地，一种办法是由国营农场开荒，一切原有的国营农场，应该根据当地可能的条件，适当地扩大耕地面积，同时，应该力求在宜耕荒地较多的地区，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国营农场，进行开荒；另一种办法是使用机器和采用其他办法进行开荒，有组织地移民耕种，这种办法因为工作复杂，规模较大，国家应该协同各地方统一地拟定具体方案，有领导地进行；再一种办法是农民就地开荒，这种办法因为进行较易，规模较小，可由各地方国家机关领导农民进行。不论是国营农场开荒，移民开荒或农民就地开荒，在今后三年，都应该积极地实施，作为增产的一种重要办法。国家从缩减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和行政机关的经费等方面所节约的资金，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之于荒地的开垦。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积极地进行宜耕荒地的调查和勘察，完成一亿亩以上荒地的勘察工作，至少完成四千万亩到五千万亩荒地开垦的规划设计工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做好准备。

二、兴修水利。水利建设，既能够扩大灌溉面积，促进农作物的增产，又能够防止水旱灾害，避免农作物的减产。许多水利设施，只要有几年增产或减灾的受益，就能抵偿水利的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

曾经大力地进行了水利建设工作，新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几年来在同水旱灾害特别是一九五四年洪水斗争中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除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巨大水利工程以外，小规模农田水利，例如受益几十亩到几百亩的工程，也应该根据各地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大量地举办。因为这种工程是分散的，建设较易，可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群众来分头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国家将给以财力和物力的帮助。

三、充分地有效地利用土地。我国人口众多这一特点，使我们有必要并有可能来充分地利用土地。扩大土地的利用除了开垦荒地和增加灌溉面积以外，应该进行土壤的改良工作，如变碱地和砂地为良田，变山坡地为梯田，变旱地为水田。在气候、雨量、地形等自然条件和肥料、水利、劳动力、畜力等经济条件的可能情况下，应该适当地增加耕地的复种指数。在山区，应该适当地进行统一规划，使农业、畜牧业、林业、农家副业的发展互相结合，发展多种经济，并加强保持水土的工作。应该鼓励农民进一步精耕细作，加工加肥，并逐步地推行适合于本地的先进的种植方法，如在低洼地区多种耐水作物，在秋涝地区多种早熟作物和增种小春作物。上述各个方面，有些省份已经取得了初步经验，这些经验，应该加以总结，并因地制宜在各地地方逐步地加以推广。各地方群众中行之有效的增产经验，也应该积极地和逐步地加以推广。

各种技术作物应该积极地和逐步地在适当的地区向山坡和山地扩大种植面积，尽可能地避免因为增加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而缩小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

四、增加稻米、玉米、薯类等高产量作物的播种面

积。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小麦高至将近两倍，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别的杂粮可能增加百分之五十，薯类象红薯、土豆等则比一般杂粮的产量要多五、六倍（在使用上，二斤半薯类可以顶一斤粮食）。毫无疑问，扩大这些高产量作物的播种面积，对缓和我国粮食、饲料的紧张情况将有重要的作用。在全国的杂粮产区和其他适当地区，如果再把一、二千万亩粮田改种薯类，则虽然每年减少粮食二、三十亿斤，但能增产薯类一百多亿斤到二百多亿斤。因此，在杂粮产区和适宜于薯类生长的地区，地方国家机关应该研究和计划扩大薯类和其他高产量作物的播种面积的问题，并积极地实施。农业机关和科学研究机关，应该认真地研究和培植薯类的优良品种，研究薯类的防治腐烂、改良储藏和加工的方法。

五、使用新式步犁、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积极地蓄肥造肥和合理地施肥，推广优良品种，消灭农作物的病害和虫害等等，都是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有效的措施，都应该因地制宜地加以实施。各级国家机关，应该加强发放农贷的工作，加强供应肥料、农具的工作，加强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抽水机站的工作，加强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在农民中进行农业技术改良和种子改良的试验工作，并组织关于这种试验和推广的农民训练班，使国家对农民的援助同广大农民群众实行的增产措施结合起来。

第三，对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

发展农业生产，除了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方针、政策、步骤有统一的领导以外，更重要的是发扬地方的积极性，加强地方党政机关对农业的领导，结合地方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的增产办法。各省必须集

中足够的力量放在领导农业增产上，至于专区、县、区、乡，则无例外地必须以领导农业生产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为工作的重点。

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都应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经验，定出本地方农业增产的五年计划，并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农村工作和农业增产的各项政策，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保证这个计划的实现。地方的农业增产计划，应该适应于国家计划的要求，根据本地方的可能条件，拟定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指标，使国家计划有更加可靠的基础。同时，地方的农业增产计划，应该切实地照顾到当地群众的具体需要，使农作物的生产能够多样地满足农民的要求，刺激和发挥农民的经营积极性。

有些农村的地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还没有集中力量去领导农业生产，也没有认真地研究增产或防灾的有效办法，并动员群众去实行增产或防灾的措施，使农业生产的领导处于自流的状态。有的在推广增产的各种先进经验和措施的时候，不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因地制宜，而是千篇一律，不问效果。有的在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时候，不是耐心地向农民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和采取典型示范的方法，而是违反群众自愿的原则，实行强迫命令。所有这些农村工作中的缺点，都应该加以改正。

这里，我还要特别地说一说关于发展畜牧业的问题。畜牧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耕畜和肥料，可以增加轻工业所需要的皮毛等原料，可以增加市场所需要的肉类的供应量，可以增加农民和牧民的收入。因此，在所有的农业区和畜牧区，都应该切实地执行五年计划第四章所规定的有关发展畜牧业的各项措施，促进

牲畜的迅速繁殖，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增加马、牛、骡、驴、羊、猪等牲畜数量的指标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机关应该在财力上和技术上尽可能地扶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的发展，并加强对牧区工作的领导。

（四）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现在我要说的是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问题，即关于改造的步骤问题，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部署问题，资本主义商业改造的部署问题，资本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接受改造的问题。

第一，改造的步骤问题。

我国目前还存在大量的复杂的私营工商业。以工业说，一九五三年私营工业（不包括个体手工业）的从业人员有二百多万人，其中十个职工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有四万五千多户，职工一百五十多万人。以商业说，一九五三年全国资本主义批发商的从业人员将近二十万人，资本主义零售商的从业人员有二百万人左右，小商小贩还有几百万人。在上述私营工商业的从业人员中，资本家占相当的数量。对于这样大量的复杂的私营工商业，要全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

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区别资本主义性质和独立劳动者性质，而分别地采取适当的步骤和灵活的形式。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分两个步骤实现的，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过渡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要鼓励和指导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这就是说，我们在过渡时期内，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而是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地实现的。我们将让资本家有一个必要的时间，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过渡形式，在国家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逐步地接受改造。

国家资本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形式。高级的形式是公私合营；中级和低级的形式，在工业中是加工定货和收购包销，在商业中是代购、代销和经销。

过去几年，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工作，一般地是由低级、中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由主要行业推广到次要行业，由大城市扩展到中、小城市。这种有系统的稳步推进的办法，经验证明是比较适当的，我们以后将继续推行这种办法。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后，在性质上已经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即在不同程度上加进了社会主义这个因素，这就限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的无政府状态和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活动，并使这一部分经济在不同程度上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同时，由于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的改变，就提高了劳动热情，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了经营管理，并使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有可能得到适当的处理。由此可见，按照我国的条件，采取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过渡形式来逐步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增长的矛盾，并由此便于逐步地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的所有制，这是必要的和行得通的。

国家对独立劳动者性质的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是按

照它们不同行业的情况，根据自愿的原则，分别地用不同的合作形式把它们逐步地组织起来，经过各种低级的合作形式，逐步地过渡到较高级的合作形式，使他们能够有效地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服务。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预计对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将达到如下的成就，就是：私营工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私营的现代工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私营商业中有一半以上将转变为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业。

第二，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部署问题。

对于国营工业、合作社营工业、公私合营工业、私营工业，在分配生产任务、分配原料、收购产品方面，必须贯彻国家规定的统筹兼顾的方针。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国家给予优先的权利，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企业则没有这种优先的权利，在这点上，它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另一方面，又应该适当地照顾私营工业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在一些方面，特别是对于公私企业的工人职员，要一视同仁。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为着调整私营工商业，就已经对一部分的私营工厂（首先是棉纺厂）实行加工定货，这种政策，对安排私营工业的生产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建设以后，为了加强生产的计划性，对许多重要原料，有的由国家差不多全部收购，有的由国家大部收购，这些收购的原料，都由国家实行统一分配。这时候，国家对于私营工业的产品，绝大部分已经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使这类私营工业成为中级形式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在这

个过程中，由于抗美援朝期间和一九五三年开始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加工定货数量的增加，由于商业部门在加工定货工作中存在某些盲目性，全国若干行业的工厂，包括国营的和私营的，都曾经盲目地扩充设备。一九五四年某些产品加工定货相对减少以后，若干行业就发生生产任务不足、开工不足的现象。同时，在开工不足的行业里，有过一段时间对公私工厂的原料和生产任务的分配不够适当，即公私合营和私营的工厂分得少些，因而私营工厂中的某些行业就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根据国家的统筹兼顾的方针，对于公私工业的生产正在进行统一安排。对原料和定货的分配，国营工厂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分得多些，但同时必须适当地照顾公私合营和私营的工厂，使它们能够维持生产。因为只有维持私营工厂的生产，才有利于巩固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团结，也有利于保持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中必要的经济联盟，同时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顺利进行。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纳入计划，合理地加以利用。同时，中央和地方都将设立专门机构，协同有关工业部，来分工管理公私合营和私营的工厂的业务。

根据统筹兼顾的方针，国家采取逐行逐业并在原行业中全面安排的办法，来进行对私营工业的改造。这种办法，不是在一个行业中只安排几家工厂，而是把这一行业的所有私营工厂统一加以安排。例如：凡有条件实行公私合营的，就进行公私合营；目前还没有条件合营的，就尽可能地加工定货，或由国家收购它们的产

品；中小工厂需要和可以联营合并的，就鼓励资本家采取以大带小的办法，逐步地联营合并，为接受公私合营创造条件；对于那些确实没有改造条件而必须淘汰的工厂，就帮助它们安排职工，淘汰企业。随着上述各种安排，有步骤地发展公私合营。

对于私营工业我们应该积极地实行公私合营，但又必须稳步前进，防止冒进。必须作好一切准备工作，使合营以后，生产管理的水平能够提高，防止无人负责、生产下降的现象。

在有盈利的私营企业中，应该依照法令规定让资本家得到适当的一部分利润；在公私合营企业中，也应该让私股得到法令规定的利益。但同时必须对那些重犯行贿、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所谓“五毒”行为的不法资本家，对那些抗拒国家领导、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破坏企业的不法资本家，给以应得的处分。

第三，资本主义商业改造的部署问题。

私营商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批发商，一类是零售商。我们对于这两类私商应该采取下列的处理办法。

原来批发商的绝大部分都是拥有较多资金、雇用较多职工的资本家。如果让批发商掌握市场的货源，他们都必然唯利是图，进行各种投机囤积的活动，而有害于国计民生。因此，必须由国营商业来掌握主要商品批发的业务。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国家对于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和主要工业品的加工定货、大量收购，批发商的业务已经逐渐缩小。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到现在，国家对粮食、油料、棉花、布匹实行了统购统销，对绝大部分工业品从出厂到零售，一般不让批发商掌握货源，

这样，就使许多供不应求的商品避免了批发商的投机囤积。国家对于已经没有货源的批发商，或则让他们经营二批发，或则正由国营商业部门录用其从业人员。有些商品，国家没有经营或者只经营一部分的，仍让批发商继续经营。国家将使这一部分现在还能经营的批发商，逐步地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批发商。

零售商是私商中的绝大部分。在零售商中，除商业资本家以外，大多数是店员和不雇店员的小商小贩，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出卖产品的手工业者，还有一部分是饮食业和服务业中的人员。零售商的业务在近年同解放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自从国家对于绝大部分工业品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和主要农产品由合作社收购以后，零售商中的大多数，不论是座商或摊贩，他们的货源只能依靠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的批发，因此他们的业务大体上已经是为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进行代销、经销。

在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一九五三年冬季以来，由于某些地方的国营商业特别是合作社营商业的零售营业额增加得快了一些，使私营零售商的营业额下降多了一些。现在已经加以调整。国家为了维持私营零售商，维持城市 and 农村的小商小贩，无论在城市或集镇，凡属国营、合作社营商业的零售额增加得太多了的，已暂时停止前进或者适当后退；在集镇上，合作社营业也已适当减少零售，多做批发，并用代销、经销形式把小商小贩组织起来。同时，各个城市集镇，将根据当地情况，按照行业定出一个既能够稳定市场物价、又能够维持私商经营的关于零售额方面的公私比重，并尽可能地使这种公私比重稳定一个时期，以便有可能对私营商业的从

业人员作适当安排，并便于逐行逐业地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第四，资本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接受改造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私营工商业在生产上和经营上遇着某些困难是难于完全避免的。在国家的统筹兼顾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全面安排的方针下，工商业资本家应该努力克服困难，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遵守国家计划，积极整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准备条件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几年来，在工商业资本家中，出现了一批能够爱国守法、对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积极态度、并起带头作用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国家是表示欢迎和重视他们的。但另一方面，仍有一些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抱着消极态度，其中有些人还在进行宪法所禁止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非法行为，用更巧妙的方法重犯“五毒”；有些人甚至抗拒或破坏社会主义改造。象这类人，就应该受到舆论的指责和法律的制裁。

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各种复杂的形式，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实行经济联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同时必须看到，这也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以为不经过斗争就能够改造的看法，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实际情况的，因此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根据宪法规定，在过渡时期，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并让守法的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法令所规定的利润；同时，对那些违法的资本家，则必须给以应得的处罚。不雇职工的私营零售商，虽然他们

是自己劳动的人，我们对他们应该加以团结，但是他们所参加的是商品流转中的劳动，同时他们是私有者，所以很容易转变成为投机者。因此，对于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须经过一定程度和一定形式的斗争。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了：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需要同资本家思想的改造结合进行。我们鼓励资本家努力学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各项政策，努力改造自己，遵守国家法律，积极地拥护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

（五）关于保证市场的稳定问题

保证市场的稳定，是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必要条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关于保证市场稳定的措施是这样规定的：

一、继续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增加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

二、随着工业农业的生产的发展，相应地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的流通；

三、对供应不足的某些主要的工业农业产品，在努力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地实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在一九五 年初就把市场物价稳定下来，这是同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和国家掌握巨大的物资后备力量这类措施相联系的。由于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所以就能够稳定币值，因而也就能够稳定物价。由于国家有巨大的物资后备力量，所以就能够供应市场上所需要的物资，因而也就能够同私商的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作斗争。这种市场

稳定，是我国在经济恢复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成就。这个成就对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显著的作用。毫无疑问，我们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必须继续巩固这个成就。

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并巩固工农的联盟，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努力增加生产，开辟货源，来继续贯彻这个政策。根据五年计划的规定，公私商业出售给人民日常消费的各种主要商品，将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增长。就几种主要的日常消费品来看，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将有如下的增长比例：粮食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三，猪肉增长百分之五十七，食用植物油增长百分之六十五点九，水产品增长百分之七十点一，食盐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食糖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二点九，棉布增长百分之五十五点一，针织品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三，胶鞋增长百分之六十九点八，煤油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三点五，机制纸增长百分之八十九点二，卷烟增长百分之八十七。这些主要的日常消费品增长的比例，按照通常的情况来说，是不算低的，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有这样高的增长比例。

但是，由于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人民购买力的迅速提高，同时由于国家投资建设的许多工业企业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够更多地增加商品量，而且目前农业原料增产进度比较缓慢的情况也不可免地使某些轻工业品的大量增产受到相当的限制，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将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而农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将比城市购买力的增长速度还

要来得快些。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在一个时期内是很难避免的。

在一九五四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的发言里已经详细地说明了粮食、食油、肉类、布匹等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这些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而不是象有些人所怀疑的那样，认为是消费品生产量的减少，或者是因为出口多了。

我们认为市场上某些消费品的供不应求的现象是不应该让它自流地发展下去的，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消费品的供应量的增加，只能在发展工业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因此，解决某些消费品供不应求的问题，根本的道路是发展工业农业生产，这是全国人民的任务，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任务。

为着继续保持市场的稳定，除努力增加生产外，国家必须分别主要商品生产的不同情况，逐步地推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以便有计划地掌握货源和组织供应，严厉地同投机商作斗争，不让私商有操纵市场的可能。

国家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开始实行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随后对食用植物油也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又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在这两年内，国家也扩大了对工业品的加工定货和收购包销，扩大了对其他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措施，无论对于商品生产者或广大消费者都是有利无害的，仅仅对于投机者不利，因为他们无法投机倒把了。这种措施，对

于国家实现五年计划，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保证，是符合于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当然，这个政策的实施，将要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几万万人民的生活习惯，并改组市场供销关系，这样一项巨大的改革，在开始实行的几年内，工作中是很难不发生缺点的。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

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国家已经在一九五五年春季开始采用了“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确定全国计划收购的总数今后三年不变。最近，鉴于城乡销量有些过宽或供应不当的情况，制定了改进粮食供应的具体办法，坚决压缩销量，以便有可能适当减少购量，并储备一些粮食。这些办法不仅使得国家能够掌握必要数量的粮食，保证国家对人民的粮食供应，而且将能够进一步地提高农民的增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对于改善城乡关系，加强工业同农业的结合，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团结，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说服工人阶级和其他缺粮人民，说服一切粮食消费者，尽量地节约粮食，减少国家的供应，使得国家有可能减少收购的数量，以提高农民特别是中农的生产积极性。

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曾经有过一些人采取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有些人借口我们在这个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而否认这个政策实施的重大成就。他们看不见一般情况是好的这个事实。当然，这些都是错误的。

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好处何在呢？农民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最近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梁希先生从浙江农村视察回来说，绍兴新鉴乡的

农民指出了十二个好处，这些就是：“支援工业好，支援解放台湾好，支援灾区人民好，稳定物价好，促进互助合作好，增加生产发展生产好，节约粮食减少浪费好，削弱资本主义好，银行优待储蓄好，改善生活好，合理供应好，节约工夫好。”我们把这些好处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支援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这就是说，保证城市、集镇和工矿区共有九千多万人对粮食的需要，保证几百万国防部队和公安部队对粮食的需要。大家知道，农民是不愿意反革命复辟的，是希望解放台湾的，而要避免反革命复辟，要解放台湾，没有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是不行的。因此，支援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同时也就是保卫农民自己的利益，农民是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的。

第二，使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买卖不受投机商人的操纵，避免生产者 and 消费者受投机商人的买贱卖贵的剥削。如果不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私商就要操纵粮食市场，大发横财，而整个国内市场物价的稳定就要被破坏，资本主义和农村阶级分化就要发展，成千成万的农民就要破产，工人群众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就要恶化。显然，农民和其他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是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的。

第三，促进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盐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这就是说，保证贫农、农村的手工业者和其他缺粮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保证技术作物区的农民和牧民、林民、渔民、盐民、船民等非农业劳动者对粮食的需要，使他们能够按照合理的价格得到粮食，因而能够安心地从事生产。

第四，保证灾区人民对粮食的需要这一点上，粮食

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象一九五四年我国大片地区遇到百年来未有的洪水灾害，如果国家没有实行这样的粮食政策，灾区人民的生产和灾区生产的恢复是不堪设想的。灾区人民认为人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好政府，这一点是很可以理解的。

第五，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打击了投机商人，打击了富农，就是说，打击了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削弱了资本主义在农民中的影响，也削弱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因而促进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发展。

由此可见，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对于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是有重大作用的，这是国家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大的措施。经验证明，这个政策是完全必要和必须坚决地贯彻的，但是收购和供应的具体办法，应该不断改善，克服缺点，巩固成绩。

尽可能地充分供应和优先供应农民以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农民卖粮所得的钱能够用来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这对于粮食收购计划的顺利完成是有密切关系的；同时，这对于减轻农村购买力所加给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也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一九五三年，在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同时，国家就确定了“城市和农村都需要的工业品，应该优先地供应农村”的方针。两年来，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部门对这个方针的贯彻，是有成绩的，但也存在着缺点。这主要是供应不及时，供应的品种不尽合需要。农民的需要是具体的，多样性的，各地都不同的。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部门必须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和农民的不同习惯等情况，认真地改

善对农村的工业品的供应。

（六）关于培养建设干部问题

科学技术人材的缺乏，显然是我们前进中的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大量的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培养熟练工人，以及各方面的专门人材。

五年内，我们培养建设干部的工作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即一方面是调整、扩充、新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另一方面是利用企业和机关的有利条件，开办各种业余学校和训练班。

全国解放以来，国家对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积极地进行了调整和扩充，并进行了新院校的建设，学生人数有了迅速的增加。五年内，高等教育以发展高等工科学学校和综合大学的理科为重点，同时适当地发展农林、师范、医药和其他各类学校，到一九五七年，我国将共有高等学校二百零八所。中等专业教育的重点也是培养工业和农业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

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培养建设干部，今后应该着重提高质量，同时兼顾数量，使提高质量和增加数量正确地结合起来。那种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对于国家建设显然是不利的。现在各高等工业学校已经感觉到学生的数量增加过快，而学习的质量过低，厂矿方面也已经普遍地要求提高技术干部的培养质量。今后必须努力地注意学生质量的问题，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适当地增加数量，使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在业务上能够相当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同时身体是健康的。当然，学生质量也只能逐步地提

高，要积极地创造提高的条件，不能够一下子要求过高过急，也不能够强求一律，但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例如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最低限度的条件，应当是政治上可靠，身体能够坚持学习，学业上能够跟得上班。达不到这些最低限度的条件，是不能够或者很难培养出有用的建设人材来的。根据这样的方针，高等教育部已重新修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并且决定将高等工业学校在两三年内逐步地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逐步地取消两年或三年毕业的专修科；对中等技术学校则决定积极地加以整顿，提高质量，并适当地扩大。同时，决定深入地研究各种专业的招生比例，使学校的各种专业培养计划，能够同各业务部门的需要互相适应。

今后关于培养建设干部的计划，应该特别重视业余教育的计划。国家应该大量地同时是逐步地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使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技术教育的在职干部，能够有机会逐步地系统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水平。在规模比较大的厂矿中或工矿地区，今后也应该逐步地普遍地设立正规的工人业余学校，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来不断地提高工人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过去我们的教育领导机关和工会对于工人的业余教育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任其自流，许多业余学校由于得不到领导，得不到适当的师资和教材而不能提高。今后必须改正这个缺点，把培养在职的工人职员作为培养建设干部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适应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建设的需要，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工业学校过分地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状况，在今后的发展规划中，应该逐步地加以改变。在沿海城市

中,今后一般地不应该再新建和大规模地扩建高等学校。内地的高等学校应该按照合理的部署,逐步地建设起来。

在积极地培养干部的同时,各级国家机关和各企业部门应该十分重视现有科学技术人员的合理使用问题。有许多工业生产单位,基本建设单位,以及其它经济单位和经济领导机关,对现有科学技术人员,还没有合理地分配和使用,或者把一些有专门技术的人放在其它岗位,或者虽然放在适当的岗位而不能发挥他们的专长和作用。一般说来,现有技术人员的分配,放在上层和管理部门的是多了些,同时,有些企业部门和厂矿对他们的创造发明和合理建议支持不力。应该认识,任何一分技术力量的浪费,都是对国家建设的一个损失。利用某些借口,而把许多有专门技术的人长时期地放在不适当的工作岗位,使他们无法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国家,这种现象决不容许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在工作中不断地提高科学技术人员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他们建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能够服从国家建设需要而不怕任何艰难困苦。

(七) 关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问题

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全国解放以来,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是逐步地提高的。在恢复时期的三年中,由于物价的稳定,就业人数的增加,工资的提高,农村中土地制度的改革,城乡人民的收入都有增加,人民的物质生活相当地改善了,文化生活也随着活跃起来了。少数民族人民由于政府对他们实行了扶助生产和发展贸易

的政策，安定了社会的秩序，同时加强了文化和卫生的工作及其他有关措施，生活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五年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和措施，如象我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已经说过的那样，又将使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新的提高。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关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的指标，是我国目前可能实现的限度。我们不否认，我国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人民需要的满足决定于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于社会所拥有的现有物质资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我国工业农业的生产是逐年发展的，但目前生产的水平还是很低的；我国工业和运输业中的劳动生产率逐年都有提高，但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也还是不高的。我们要发展生产，并使生产的发展保持经常的高速度，为改善人民生活建立物质基础，就必须扩大重工业和其他各种事业的建设，这就不能把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果实都用来改善生活，而必须把适当的部分作为资金，用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放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用必要的财力来保证国家建设，以便建立人民生活改善的物质基础好呢？还是减少和推迟建设，而不合理地随便增加工资或者随意开销好呢？我们认为，从全国人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来考虑，应该首先用必要的财力来保证国家的建设，同时按照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来提高生活水平。因为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提高生活水平；没有今天的刻苦建设，就不可能有将来更加幸福的生活。那种认为可以不经过刻苦的建设而希望一下子把人民生活提得很高的想法和做法，是纯粹的幻想，是错误的。

当然，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应该随时随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那种对人民生活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注意解决那些必需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要把人民当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在保证国家建设的前提下，适当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五年计划规定的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指标和措施，必须尽可能地保证实现，使我国各族人民群众真正体验到国家建设的必要和对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从而更加积极地创造性地参加国家建设。

人们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可否比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更多地增加日常消费品的生产量，来更多地供应人民的需要？我们认为应该努力增产，也应该努力增加供应量。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就业人数还会增加，农民购买力还会提高，过去对这些消费品消费得少的人都可能要增加消费量，而全国人口有六万万之多，因此，实际上每个人平均所能增加的消费量暂时还是有限的。我们当然应该继续努力去发掘可能的生产潜力，忽视这种努力是不对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工业原料的增产是暂时受着一定的限制的。农产品或者用农业原料制成的消费品的大量增产，只能在大规模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开荒之后。

人们也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可否增加文化教育事业的设施，来适应人民在这方面越来越多的需要？我们认为应该采取更多的办法来适当地处理这个问题。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各种指标，在一九五二年已经超过了解放以前的最高水平，在这个基础上，五年计划又规定了进一步发展的指标。但是，由于人民对文化生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某些文化教育的设施就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的需要，如象小学不能完全适应学龄儿童入学的要求，中学不能完全适应小学毕业生升学的要求等等。为着处理这个问题，国家除了继续有计划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外，提倡由人民来自办某些文化教育事业，如小学校、农民业余学校、业余剧团等；这些文化教育事业，国家将在工作上给以指导，并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以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援助。同时，各地方各机关、各企业都应该尽可能地举办各种补习班、夜校、函授学校等等，而使那些不能升学的青年在劳动生产中继续提高文化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是一种稳步前进的提高，人民的幸福要靠人民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取得。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经过六万万人克勤克俭的劳动，在进行几个五年计划大大地提高我国的生产力之后，就有可能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这是我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的康庄大道，其他的捷径是没有的。

（八）关于厉行节约问题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五年计划。建设重工业，必须长期地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这种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是要依靠我国内部积累来取得的。因此，必须实行极严格的节约制度，消除一切多余的开支和不适当的非生产的开支，不能容许任何微小的浪费，以便积聚一切可能的资金，用来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并增加国家必要的后备力量。

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曾经说

过：“规定极严格节省的办法，积蓄为资助我国工业化所必需的经费，——这就是我们为达到建立重工业和实现五年计划目的所应走的道路。”苏联走过的这条道路，也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走的道路。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比苏联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要落后，我国建设资金的积累也就会比当时的苏联还要困难。厉行节约以积累建设资金，对我国就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因此，我们就非学习苏联人民当时节衣缩食刻苦建设的精神不可，就非继续发扬我国人民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可。

几年来，随着国家机关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的不断改善，我们逐年地降低了建筑安装、生产、运输交通的成本和商品流转费用。这样就增加了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减少了国家建设资金的浪费。这些成绩，无疑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目前我们有些方面、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仍存在着很严重的浪费现象。有相当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忘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了解在人民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仍需要我们长期的自我牺牲的努力，因而时常地破坏了国家的节约制度，破坏了经济核算制，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为着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必须更加认真地执行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指示，有效地建立各种节约制度，真正地学会用节约的方法来管理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而在各个方面同一切的浪费现象作无情的斗争。

首先，我们必须大大地削减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

几年来在非生产性的建设中，铺张浪费的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

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中央六个工业部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的非生产性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六，但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部门的非生产性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百分之十四点五。在一九五四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的投资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投资比例。

在非生产性的房屋建筑中，由于忽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盲目地追求所谓“民族形式”，讲究豪华装饰，大量地采用贵重的或特殊的材料，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单就“大屋顶”来说，北京市内各机关建筑的三十九座房屋即因此浪费了五百四十万元。被人称为“地质宫”的长春地质学院校舍是一个很出名的豪华建筑，该院是利用伪满未建成的皇宫基础建设的，因为搞了好多不必要的装饰，每平方公尺造价为二百二十元，加上原有基础的造价则达三百元，超过国家规定造价一百二十五元的百分之一百四十。有些职工宿舍的造价也过高，例如鞍山钢铁公司在一九五三年修建的职工宿舍十五万平方公尺，单位造价高达一百六十三元。

过分地增加装饰的结果，不但会使建筑物的造价大大增加，而且会使使用面积大大减少。北京有一个建筑物的主楼，每平方公尺的造价达二百九十三元，而使用面积只占百分之四十四。鞍钢设计大楼的造价高达二百四十元（比预算增高百分之六十，共浪费一百三十八万元），但使用面积还不到百分之五十。这些追求形式的豪华建筑，同时也无例外地都忽视了使用者的需要和利益，

例如有一个疗养院的洗衣房，单位造价高达三百四十六元，安装上洗衣机后空隙太小，工人操作很不方便；其厨房面积四百五十平方公尺，单位造价高达二百七十五元，却无处存放米面。

建筑了豪华的房子，就必须相应地购置豪华的室内设备，因之购置地毯、沙发等高级奢侈品的风气也随着发展。

所有这类豪华的非生产性的建设，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方针不相符合的。

很显然，削减上述这些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和克服其他的浪费，这将节约出一笔很大的资金。

第二，我们必须大大地降低生产性建设的成本。

有些工业建设单位不按照建设程序办事，不弄清情况，不进行有系统的准备工作，甚至建设方案尚未确定，就盲目备料，仓促施工，因而普遍地发生了浪费资金、积压器材的严重现象。例如有一个钢铁厂的改建工程，就是浪费的典型之一。当这个厂的改建规模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就开始了设计，设计没有作出，就进行施工，施工开始后，设计又经常发生重大的修改，致使施工图纸不能及时交付，或交了又作废，有些图纸交的先后和施工顺序颠倒，有的图纸注明“仅供参考”，都不能作为施工的依据。由于边设计、边施工，设计不断改变，施工计划也不断被打乱，这就造成有时窝工，有时赶工，而设备、材料就被积压。在这种情况下，工程进度想快反慢。该厂的建设工程还才开始，一九五四年完成的工作量还不到原定计划的一半，仅窝工开支就有二百万元，积压材料就达七百多万元。这种不作充分准备、不作好设计而进行施工的教训，必须引起一切基本建设单位的

深刻注意。

愈是重要的建设单位，浪费的可能性愈大。因为进行这些工程，常常是全国支援和不惜工本的，人们注意的是希望它建成，常常忽视和原谅它的浪费。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底为止，共积压器材一千零五十七万元，各种浪费如材料报废，设备损坏，大材小用，优材劣用，窝工，设计错误，以及管理不当等共计浪费六百三十万元。

施工中的浪费，还表现在劳动组织得不好，机械设备的利用率低，建筑质量低，其结果必然是劳动生产率低，建筑成本高。

很显然，降低生产性建设的成本，这也将节约出一笔很大的资金。

第三，我们必须大大地加强各生产部门、运输交通部门和商业部门的经济核算制。

我们有许多企业的产品质量是很不好的，废品是很多的。例如第一机械工业部有些厂，由于技术掌握不住，产品质量低劣，造成生产中大量返修和报废，一九五四年全年的铸件废品率为百分之十二点五（苏联的铸铁废品率为百分之五），报废的生铁达二万多吨，连同加工中的废品，全年共损失二千多万元。

一九五五年第一季度内，许多产品质量不好，特别是重工业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企业的产品质量不好的现象较为普遍。在重工业部所属企业的产品中，第一季度生产的生铁，由于含硫过多而不合规格的达四千六百三十二吨；鞍钢生产的大型钢和桥梁钢，由于化学成分不合要求而有百分之三十不合规格；玻璃的生产，所有企业都没有完成一级品率的指标。在第一机械工业部

所属企业的产品中，例如大连工矿车辆厂第一季度生产的五十吨敞车三百二十二辆中，由于性能达不到设计的要求，有百分之九十需要返工重修。特别是沈阳第二机床厂，该厂生产的三百八十台钻床，由于违反应有的试制程序，性能达不到设计的要求，全部需要返修，仅零件报废一项，即损失一百二十万元，以致从一九五四年九月起到一九五五年第一季度为止，都没有能够出产成品。犁铲的生产，由于犁铲的曲线不合要求，淬火后硬度达不到标准，致有百分之四十的产品是废品。在纺织产品中，纺织工业部第一季度内棉布和印染布的正品率计划都没有完成。轻工业部所属企业的某些产品，例如胶鞋、食糖等质量不稳定或下降的情况，也都比过去严重。

我们有许多企业因为管理不善而浪费了很多资财。例如哈尔滨食品公司一九五四年一年中发生的浪费事件就有五十多次，有帐可查的浪费数字就达五十七万元之多。一九五四年这个公司的畜产加工厂共亏损八十多万元，但究竟浪费损失多少，至今还是一笔糊涂帐。

在报上曾经发表过一个材料，商业部所属的一些企业在一九五四年曾经因为管理不善，单是死猪和臭蛋就值八百万元。

我们还有很多企业，其中非生产人员过多，机构臃肿。例如本溪钢铁公司的生产工人只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管理机构人员约占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类的例子是不少的。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调查：石景山钢铁厂、石景山发电厂、清河制呢厂三个单位，可以减少三千六百多人，占三个单位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很显然，加强各经济部门的经济核算制，从而减少浪费，减少废品，降低消耗定额，降低成本和流通过费，减少非生产人员，这也将节约出一笔很大的资金。

第四，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缩减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费。

几年来，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费，在国家整个支出中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有许多国家机关还是人浮于事，人员太多，而且有的机关还在盲目地招收人员，这样就使得行政管理费难于更大地削减下来。根据精简机构、紧缩编制、调整干部的方针，现在已经决定从中央各机关起，开始整编的工作，有计划地从中央各机关中调出一批干部以加强下层和基层的生产单位。地方各级机关，也应该有步骤地来进行这种整编的工作。事实证明：凡属人员过多的机关，在减少一些人之后，非但不会减弱工作，而且会工作得更好一些。以后各机关需要增加的人员，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而且应该尽可能地在原有的机关人员进行调整。国家应该制定法令，规定所有公务人员（企业职工也在内）都必须遵守政府调动工作的命令。这样才可以合理地使用人力，节省国家的财力。

至于许多国家机关还存在的许多铺张浪费的现象，那是必须立即禁止的。

很显然，在精简机构和杜绝国家机关的许多铺张浪费的现象以后，这又将节约出一笔很大的资金。

总之，今后国家必须在各方面建立一系列的节约制度和节约办法，规定哪些是允许做的，哪些是不允许做的。凡是那些不允许做的，如果做了，就是犯法。

国务院规定：在今后三年内，生产性建设的建筑安

装的造价，应该比原计划至少节约百分之十；各种非生产性建设的造价，应该比原计划至少节约百分之十五。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不论生产性建设或非生产建设的成本，每年还应该力求降低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或者更多些。这样，就将至少为国家节约二十亿元。这一笔资金，如用之于工业建设，就可以建设一个年产一百五十万吨钢铁的冶金企业，或三十个五万千瓦规模的电站，或五个年产一万五千辆拖拉机的工厂；如用之于铁路建设，则可以新建铁路三千公里以上；如用之于农业建设，则可以开荒四千万亩到五千万亩。由此可知，厉行节约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起何等重大的作用。

为着厉行全面的节约，必须严厉地批判各种反对节约、助长浪费的思想。

一、必须批判那种“百废俱兴”的想法。因为所谓“百废俱兴”，就会使建设失去重点，而且因为把资金分散在过多的工程里面，结果将使工程建设的时间拖得太久，不能迅速地发挥投资的效果。

二、必须批判那种认为“既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则其他非生产性的建设和福利设施也就必须现代化”的想法。因为生活现代化应该先要有工业现代化的基础，还没有工业化的基础和农业的现代化，而过早地要求生活现代化，实际上就会推迟工业现代化。

三、必须批判那种在预算上“宽打窄用”的想法。因为既然允许宽打，就一定不能窄用，宽打只能是宽用，结果就必然造成浪费。

四、必须批判那种认为“建设经验不够，工作经验不够，浪费一点不可避免”的想法。因为主管工作的本人有了这种想法，那么浪费就一定不可避免。

五、必须批判那种把浪费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孤立起来看，而把浪费当作“小事情”的想法。现在这样的“小事情”，在任何一个工厂、企业，任何一个机关、学校，都是存在的，因为这叫做“小事情”，就天天熟视无睹。但是任何一项小的浪费，如果不加纠正，推算到整个部门、到全国，推算到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那就没有一项不是巨大的浪费。我们只有这样去观察“小事情”，才不致熟视无睹地继续浪费，才知道纠正这种“小事情”是大有必要，需要立即动手的。

克服上述的一系列的错误思想，是开展节约运动的条件。

国家必须加强财政监督，来保证节约制度的实施。不但财政部门要加强财政监察机构，各个企业部门和行政、军事部门也都要建立自己的财政监察机构。任何机关、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财政制度，服从财政监察。任何机关、任何人，在浪费问题上，都不应该原谅自己，或者原谅旁人，或者用彼此原谅来代替彼此间的监督和检查。

节约运动必须是全民的运动。全国人民首先是全体职工都要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各个企业和机关的节约资金、反对浪费、监督财务的斗争。

（九）关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同我国建设的关系

现在我来说一说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援助同我国建设的关系。

大家知道，我国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地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分不开的，特别是同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苏联帮

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建设单位，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

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是全面的和系统的。苏联援助我们建设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单位，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供应新种类产品的技术资料，一直到指导新产品的制造等等，总之是从头到尾全面地给予援助。苏联提供的设计，广泛地采用了最新的技术成就，苏联给我们的设备，都是第一流的、最先进的。为着帮助我们，伟大的苏联工人阶级用最高的劳动热情力求更快地和最好地制造我们所需要的设备，伟大的苏联政府尽先地把最好的设备供应我们。苏联政府和我国政府还签定了科学技术协定，通过这个协定，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帮助也是很大的。苏联政府主动地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我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并同我国签定了和平使用原子能的协定。

苏联在繁忙的共产主义建设中抽出了大批的专家来帮助我们。他们给我们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具体地帮助我们进行各项经济工作。所有苏联派来我国的专家，不仅具有精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忘我的劳动态度。他们在我国工业、农业、林业、水利、铁路、交通、邮电、建筑、地质、教育、卫生以及其他各个部门中，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合作方面，忠诚无私地、毫无保留地将他们的经验、知识和技能贡献出来，他们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一样看待。苏联专家们那种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已经成为

我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应该说，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成就，是同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

苏联用了很大的力量，帮助我国培养技术人材。苏联接受了我国大量的留学生和实习生，并且给予学习和实习的各种方便的条件，这对于我们掌握工业的近代技术、保证新建企业的开工生产以及提高我们的科学水平，是极关重要的。来我国的苏联专家，在培养我国的技术人材方面，也有很多的贡献。

苏联政府给了我国重大的财政援助，以最优惠的条件陆续地贷款给我们，并且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上使我们得到廉价的技术装备和器材。这种贷款和贸易上的利益，也就帮助了我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帮助了我国的工业建设。

由此可见，我国现在的建设所以能够有这样大的规模，有这样快的速度，有这样高的技术水平，并且还能够避免许多错误，苏联的援助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除了苏联的援助以外，我国的建设还得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人民民主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援助。同时，蒙古、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人民民主国家同我国也有经济上的合作。

英雄的朝鲜人民和英雄的越南人民，他们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的和平民主的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斗争，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也有着巨大的意义。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特别是对苏联的伟大的、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为着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就必须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联盟和友好合作，以促进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共同高涨，增强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

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了两年。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两年计划执行的情况，基本上是好的，虽然在工作上、计划上暴露了若干错误和缺点。

在工业农业总产值方面：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四，一九五四年又比一九五三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四。两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九，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六的速度。

在基本建设方面：两年来基本建设计划，每年都接近完成。没有全部完成计划的原因是：设计所需要的基础资料的收集工作延迟了，设计工作赶不上，图纸、材料、设备不能按时供应，缺乏按照进度所需的切实的施工计划，施工现场还不够正规化，还有相当混乱的现象。

两年实际完成的投资额（即工作量），占五年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两年中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有一百三十六个，新增生产能力举其重要的来说，有：钢四十二万七千吨，电五十三万千瓦，煤一千三百万吨，水泥六十五万吨，纱锭七十万枚，纸四万吨，汽车轮胎十六万条，糖十万九千吨。两年中新建铁路铺轨一千四百多公里，其中集宁到二连的铁路和黎塘到湛江的铁路已经铺轨完成；新建公路六千六百多公里，其中主要的是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两年中完成的重要水利工程有：淮河流域的三河节制闸和薄山水库，永定河的官厅水库和河北省的独流减河工程等。淮河流域的佛子岭水库也已基本完工。它们在一九五四年防御特大洪

水的时候起了显著作用。两年中由国家建筑的各种房屋面积约七千八百余万平方公尺。

在工业生产方面：两个年度计划都超额完成，一九五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点七；重要产品的产量都有显著增长，如铁增长百分之五十六，钢增长百分之六十五，发电增长百分之五十一，煤增长百分之二十六，水泥增长百分之六十一，木材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一，棉布增长百分之三十七。两年国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已提高百分之二十九，产品成本已降低百分之九点六。两年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变化：第一是现代工业在工业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上升到一九五四年的百分之三十三；第二是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的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六十一上升到一九五四年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一。

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一九五三年许多地区的春旱秋涝和一九五四年许多地区遇到了特大的洪水，影响到两年农业生产都没有完成计划。但一九五四年的粮食产量，就全国范围来说，比一九五二年仍增长了百分之三点四，糖料、油料、烟叶等技术作物在两年中一般都有增加，只是棉花减产了。两年中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四年底已发展到将近五十万个，为今后农业增产和农业合作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运输交通方面：两年铁路的货物周转量增长百分之五十五，旅客周转量增长百分之四十五；沿海和内河轮驳船的货物周转量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公路汽车货物周转量增长百分之一百七十五；民航和邮电的业务也有

相当发展。

在商业方面：一九五四年社会零售总额，比一九五二年大约增长百分之四十一·七。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在国内商业批发中所占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六十三上升到一九五四年的百分之八十九；在社会零售中所占的比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三十四上升到一九五四年的百分之五十八。

在文化教育和保健方面：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增长百分之三十三，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数增长百分之四十四，小学两年来着重整顿巩固，在校学生人数也有增长。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二年医院病床增长百分之三十四。

两年来，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的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国家机关的工人职员总数共增加大约三百万人，除去由私营转入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的工人职员，实增约二百万人；全国工资总额共增长百分之五十六，工人职员平均工资以货币计算增长百分之十四。农民从农业和副业所得到的收入，两年增长约百分之七。

以上情况说明，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的年度计划，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已经胜利地实现。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种指标，是完全有可能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曾经一再无耻地散布谎言，说中国没有可能实现工业化，或者说五年计划已经失败。但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而且将继续用灿烂的事实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不但有力量完成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有力量完成更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当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哪一方面的任务，都是很艰巨的。后三年的任务要比前两年更为艰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要完成五年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八，许多规模巨大、技术复杂的工厂、矿山、铁路、水利的工程要同时开工；工业总产值要在一九五四年的基数上增长百分之二十九，许多技术复杂的新类产品要试制成功和大量生产；农业生产的任务是很紧张的，以一九五四年为基数，粮食产量要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七，即增产四百六十六亿斤，棉花产量要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即增产一千一百四十万担；铁路货物周转量要在一九五四年基数上增长百分之三十，公路汽车和水路的运输任务也很繁重，根据社会购买力估算，社会商品零售额要比一九五四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七。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方面的工作任务，在后三年也是很艰巨的。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要求更加深入和细致，并且应该根据统筹兼顾的方针，对私营经济加以统一安排。以上种种，说明后三年是五年计划中最关重要的年份，只有完满地做好后三年的工作，才能全部完成五年计划。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原来生产力薄弱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工作，是不能够不遇到困难的。我们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在过去的两年多中，我们已经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许多艰巨复杂的工作任务，但今后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工作任务也将更艰巨更复杂。我们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技术人材、设备供应同建设需要的矛盾而发生的困难，农业落后于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发生的困难，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各种经济成份统筹安排的困难。面对着这些困难，我们必须最合

理地和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和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克服。对于国内外敌人，我们必须随时地保持充分的警惕，战胜他们的破坏和反抗。同时，由于我们的计划工作经验缺乏和统计资料不全，这就不能不影响到计划的准确性。因此，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我们必须随时注意计划工作和实际的发展情况相结合，从而根据实际的经验，根据广大群众的创造性的经验，来不断地使计划能够比较准确和比较完善。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使我们在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道路上得到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因此，全国人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全部实现五年计划而奋斗。

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斗争中，全国工人阶级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具有首要的意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努力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政治觉悟、技术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展开劳动竞赛，巩固劳动纪律，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使广大的工人职员成为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而斗争的积极战士。

大家知道：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不仅是工业的计划，同时是农业和其他所有经济部门的计划。因此，所有的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的工人职员以及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所有的国营农场职工、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个体农民、牧民和渔民的劳动，所有的国家经济工作部门，包括工

业、农业、林业、水利、铁道、交通、邮电、商业、粮食、财政、金融各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劳动，都是完成五年计划所必须互相配合而不可少的劳动，都是光荣的劳动。正因为这样，不但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和国营农场的工人职员，负有完成五年计划为他们规定的指标的责任，而且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的工人职员以及一切从业人员，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国家经济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同样负有完成五年计划为他们规定的任务的责任。只有全国人民群众都完成生产任务，才能全部完满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

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部门，工人和农民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基础，加强和巩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工农联盟这个基本的社会力量，来充分地发挥我国经济上一切可能的潜在力量，同时准备必要的后备力量，以便使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得到可靠的保证。

大家又知道：我们在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方面的一切经济工作，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它们必须有教育、文化、卫生、司法、监察、公安、民政、外交、国防等项工作的配合。因此，所有在这些方面服务的人员的劳动，包括文化卫生事业中一部分自由职业者的劳动，也都是五年计划中必不可少的劳动。认真地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也就是完成五年计划中他们所应当担负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担负着保卫祖国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的重大的责任。

几年以来，在工业、农业、运输交通、商业等经济战线上出现了许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文化和教育的战线上也出现了许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各个行政工作部门也有许多模范工作者，这是我们国家的荣誉。所有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都应该进一步地发挥自己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团结和带领着广大群众，为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

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斗争中，科学、技术工作者担负着重大的责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迫切要求科学和技术，没有科学和技术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不论在哪一部门工作的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都应该不断地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加强理论同实际的联系，注意研究工作同生产工作的联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科学和技术的作用，把每个人的智慧贡献给国家和人民。

青年和妇女都应该积极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青年们应该锻炼身体，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养成劳动习惯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做好工作，为建设和保卫祖国服务。妇女们也应该提高政治觉悟，提高生产和工作的能力，积极地参加国家建设事业。

五年计划同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都有密切的关系。五年计划要求国内各民族更巩固地团结起来，要求国内各民族加强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和合作。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应该积极地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事业，共同努力来建设我们的祖国。同时，按宪法的规定来实现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努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

业，加强医疗卫生工作，汉族人民必须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给各兄弟民族以真心诚意的帮助，以逐步地改善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根据本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尊重人民自己的意愿。

由于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存在着联盟的关系。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还有重要的作用。工商业资本家在五年计划中的责任，就是应该服从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老老实实地服从国家计划，做好国家委托的任务，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他们就能够正确地发挥他们在五年计划中的应有作用，而对五年计划作出一定的贡献。

华侨是热爱祖国的，他们希望祖国的繁荣和强盛。国家应该注意保护华侨正当的权利和利益，同时，华侨也应该进一步地团结起来，积极地参与祖国的建设事业。

要完满地完成五年计划，不但必须有全国范围的方针、政策、步骤的统一领导，而且必须有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党组织的具体措施，来实现计划规定的当地任务特别是关于农业生产的任务。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党组织不仅必须负责管理地方的各种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而且必须管理自己管辖区域内属于中央的工厂、矿山、基本建设工地、经济企业、文化机关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检查这些企业和机关对于国家计划的执行程度，监督和帮助它们完成计划。散在各地的中央所属的企业、机关必须服从地方国家机关和党组织的领导，在它们当中如果有不服从地方领导的倾向，那就必须进行严肃的斗争加以纠正。国务院所属的各部必须充分地依

靠地方领导机关的积极性，来实现国家的计划。

为了胜利地向前推进我们的事业，一切共产党员，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切企业部门的工作干部，都应该进一步地改进工作作风，努力克服工作中的各种缺点和错误。毫无疑问，我们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是积极努力地去完成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委托的工作任务的，是能够联系群众和进行自我批评的。但不能否认，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由于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已经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不愿揭露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不能深入下层进行具体领导，而是采取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方法来进行一般化的领导，对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和国家的财产不负责任。甚至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夸大自己的工作成绩，隐瞒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包庇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很明显，如果我们不同这种不良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五年计划就不能胜利实现。因此，党和国家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忠诚老实地履行对党和国家的责任，以身作则，勤俭刻苦，努力钻研业务，提高政治水平，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情况，具体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揭露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督促和帮助所属单位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

我们已经开始了巨大规模的建设，我们的经验不够，我们的技术水平不高，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学习经济工作和其他有关的工作，我们就不能顺利地完成五年计划。我们应该一方面在生产和工作中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

提高自己的能力，一方面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知识，合理地运用到生产和工作中去。我们要向所有的兄弟国家学习，特别是要向苏联学习，向苏联专家学习。人们经常谈论着对于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援助的感谢。由于苏联和各兄弟国家伟大的无私的援助，人们这种感谢心情是完全自然的。但是感谢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最好的办法，不是别的，是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是学会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专家在建设中所教给我们的知识，来全部实现国家的五年计划。我们现在的建设比之当年苏联的条件有利得多，因为苏联曾经单独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却已经有了经验很多、技术很高的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援助。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来进行学习，以便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把我国的建设经验和科学技术提高到应有的水平。

我们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同时必须做好政治工作，经常地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切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都应该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提高理论水平，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

实现五年计划，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五年计划的完全实现，将使我国的工业和全部国民经济有巨大的发展，将使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比重大大增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比重很大缩小。这也就是说，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将更加巩固。所有这些，全国人民和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都将为之欢欣鼓舞。可是人民的胜利就

是人民的敌人的失败，就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卖国集团、一切敌视人民的分子的反革命复辟企图的失败。人民的敌人是决不愿意自己失败的，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来破坏我们的五年计划。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正在进一步对我们进行战争的威胁；隐藏在大陆上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残余分子经常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些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来煽动群众；某些不法资本家也在采取各种手段对社会主义改造进行抵抗。所有这些都说明，人民的敌人将采取各种方法来破坏五年计划，而实现五年计划是一种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全国人民必须时时刻刻地提高政治的警惕性，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击破国内外敌人和反动分子对于五年计划任何形式的破坏。曾经有不少的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于暗藏的敌人的破坏活动，麻痹大意，对于反革命分子所造成的各种事故，熟视无睹，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必须立即纠正。最近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是全国人民在同反革命阴谋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是全国人民团结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始终保持着巩固的牢不可破的团结。特别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党就更加团结和更加巩固了。高岗、饶漱石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斗争，是一次保卫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共产主义的斗争。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胜利证

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一致，并将进一步地巩固这种团结。当然，中国共产党为着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将继续提高警惕，注意和粉碎国内外敌人的阴谋诡计，同一切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纠正某些共产党员骄傲自满的情绪，更加团结一致地和更加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而斗争。

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的时候曾经指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团结，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的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地加强同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以进一步地加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我国也将进一步地加强同亚洲、非洲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友好合作。根据有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已经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我国愿意根据同样的原则，同世界上任何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扩大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只要这些国家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就是保障本国的独立、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参加一切为缓和国际局势而进行的斗争。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自由的运动，在实际上援助了我国的建设。凡是爱好和平、民主

和自由的人民，当然是必须互相援助的。

各位代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它将开始改变我国百年来经济落后的历史，把我国向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推进一步。象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的经验又不够，我们必须勤勤恳恳地做工作，同时又必须具有象过去那样不怕困难、百折不回、争取革命胜利的精神。我们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国家对内对外的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一切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和总结发言。陈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作了发言。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为副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务院关于选举工作的指示

1955年3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决定。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和镇的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在1956年办理。目前正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的时期。在这一新形势下进行选举工作，应该使人民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民主教育，更加激发起参加国家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积极性，并且使国家机关补充新生力量，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前进。现在，对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和镇在今年内进行的选举工作，作如下指示；

一、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应该妥善地安排选举工作和其他各项中心工作的时间，并且应该集中力量，争取用较短时间做好选举工作。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基层选举工作一般在7月至11月间进行。直辖市、县、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可以同时准备、衔接进行。直辖市、县、设区的市在确定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时候；应该同时确定直辖市、县，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并且分配到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以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可以选出出席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辖市、县，设区的市就可以紧接着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直辖市、县、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至迟应该在1956年12月底以前举行。

二、依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本级人民委员会主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都应该在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建立选举委员会，负责办理有关选举的各项具体工作。省、自治区可以设立选举工作办公室，指导和督促下级的选举工作。各级选举机构建立以后，应该立即制定选举工作计划，召开会议，部署工作，并且结合这种会议，训练干部。县以上的选举机构，应该负责平衡所属县和县或者乡和乡之间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工作，以及编造选举经费预算的工作。

三、基层选举工作，仍然应该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参照 1953 年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中规定的各项原则办理。在具体作法上，必须适应当前情况，力求简便和切合实际。基层选举的一切活动，应该尽量利用生产空隙或者结合生产去进行，并且争取在 20 天左右完成一个基层单位的选举工作。

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和城市各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迅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政治、文化水平业已相应提高的新情况，1956 年的选举工作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层选举工作应该实现三项具体要求：(1)做好选民资格审查工作，不让一个应该有选举权利的人被错误地剥夺了庄严的选举权利，也不让一个不应该有选举权利的人窃取了庄严的选举权利，(2)发动选民自觉地热烈地参加选举；做到参加选举的选民人数一般高于全国第一次普选时当地选民参加选举的比例，(3)做好选举代

表的工作，把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先进代表人物以及在其他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选举到政权组织中来。

(二)选区和选民小组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划分。农村以生产单位为基础，按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小，就一个社或者几个社划成一个选区；大社可以按照生产队的居住地区划分选区；还没有入社的选民划入就近的选区。城市以选民居住地区为基础，按照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的大小，划分成一个或者几个选区，较大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能够产生一名以上代表的可以单独划成一个选区，不够产生一名代表的可以由邻近的几个单位或者同当地居民合起来划成一个选区。牧业、林业和水上等地区，应该从便利生产、便利选民参加选举活动出发，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划分选区。

(三)选民登记和选民资格审查应该在全国第一次普选时办理登记审查工作的基础上，采取普遍登记、重点审查的方式进行。选民登记可以用原有的选民登记表册核对，把其中婚出、迁出、死亡的选民以及这一时期依法剥夺了选举权利的人划掉，再把婚入、迁入和业已年满18岁的选民以及依法恢复了选举权利的人补上。计算年满18岁选民年龄的时间，以当地进行选举的日期为标准。审查选民资格的重点应该是需要依法给予选举权利或者剥夺选举权利的人。选民资格审查确定以后，应该重行填写选民登记表册，填发选民证，并且公布选民名单。不论任何人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都应该充分保障他们行使申诉和诉讼的权利。

(四)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应该采取有领导地联合提名和选民提名相结合的方式。在联合提名以前，首先通过

当地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在选民中广泛酝酿，把意见集中起来，再由选举委员会邀请这些方面的代表协商，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交选民讨论，并且依据多数选民的意見，加以认真的修改和补充；最后由选举委员会在选举以前公布代表候选人的正式名单。对于公布的代表候选人正式名单仍有不同意见时选民，在选举的时候；可以另选自己愿意选的其他任何选民。选举的方法必须力求便利群众。在农村，应该按照选区召开选举大会；在城市，一般应该根据选民不同的生产和工作时间，按照选区分段设立投票站进行选举，对不能参加选举大会和到投票站选举的选民，还可以采用流动票箱由选民就地选举等办法。

(五) 开好基层单位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应该是：选出本届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出席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审查上届本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讨论解决群众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建立代表固定联系选民的制度，并且结合当地实际需要，整顿和健全人民委员会的各种组织、制度，以充分发扬民主，巩固选举的成果。

四、自治州(盟、行政区)和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除今年建立起来的可以不再进行选举外，都应该按照本指示的规定进行选举，正在准备建立的，可以结合这次选举建立起来。没有实行普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地区，今年是否实行普选，由各有关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提出意见，报告国务院批准。

我国与阿富汗建交

1955年1月20日与我国建交。

阿富汗,古波斯语意为“山口人”,位于亚洲中西部。面积65.23万平方公里,人口1643万人,普什图族占40%,塔吉克族占30%左右。官方语言为普什图语和达里语。98%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首都喀布尔。

阿富汗是农牧业国家。主要出口棉花、皮革、天然气、干鲜果品等;主要进口石油及其制品、小麦、纺织品、茶叶等。

阿富汗在1747年形成统一国家。1919年8月19日宣布独立。奉行独立,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是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

小资料

1955年2月17日,国务院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21日公布。由中国人民银行从3月1日起在全国开始实行。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世界部分

世纪回眸

柏林墙下的窃听隧道于 1955 年竣工

1961 年 8 月建成的柏林墙是东西方冷战的见证。1989 年柏林墙推倒后，美国媒体披露，柏林墙下有中央情报局专门用来对付苏联的一条窃听隧道。

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秘密而艰巨的窃听工程，它从 1949 年开始策划设计，用了五年才开凿完成。当时，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柏林也被一分为二，苏联和美国的间谍部门就此在柏林摆开战场。美国间谍专家发现，苏联军事设施有地下通讯电缆通往东欧各国，中央情报局完全可以在苏军通讯电缆附近秘密挖掘隧道，沿线窃听。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草拟了一份计划大纲，并把这项窃听工程命名为黄金计划。希伦科特还要求英国人参加这项窃听行动。

英国间谍以惊人的速度查出，苏联与东德及东欧驻军的通讯是以东柏林为中心。美国人便开始实施窃听隧道计划，这条秘密隧道以西柏林南面一处美军设施为起点，在地下五米处开挖，伸延至东柏林，主段长五百多米，直指苏联的地下通讯电缆，里面布满了电子窃听器，能清楚地截听到苏军的电话和密码信息。

1953 年 2 月，艾伦·杜勒斯接任中情局局长，他全力支持这项计划的加速实施。窃听隧道于 1955 年 2 月竣

工，其中一段直通到索恩法尔德公路下面，竟然接通了苏军总部的电话通讯电缆。隧道之内设有数百个监听器和数百台录音机。

为了迷惑苏联人，也为了不让自己人胡乱猜测，中央情报局还在西柏林隧道起点处，兴建了伪装的仓库和雷达站。当时苏联间谍也曾对此产生过怀疑，当得知是建仓库和雷达站后也就不再在这里浪费精力了。

1954年8月，柏林窃听隧道开始试验截听苏军的电话，第一个重要信息于1954年年底截获：苏联军方传达克里姆林宫指示，要求驻东德苏军保持良好纪律，配合政府同联邦德国（西德）改善关系。分析人员根据这份情报作出判断：柏林结束战争状态有望。果然，1955年1月，苏联宣布与西德结束战争状态，9月13日双方建交。

窃听隧道正式运作后，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央情报局，他们凭借这条隧道，掌握到苏联夸大了在东德的驻军实力。同时中情局还获知，苏军在东德筑建了特殊的武器库，从而有效地掌握了苏联的欧洲战略和意向。

这条隧道使用了一年多后，于1956年4月被苏联驻东德的通讯兵发现。当时一条由东柏林通往莫斯科的电话线失灵，通讯兵进行检修时，忽然发现地下电缆有一段被人搭线破坏。经过进一步检查，通讯兵终于找到了这条窃听隧道。苏军突击队员火速赶到，用烈性炸药炸开隧道攻入里面。几名美国情报人员还在里面秘密作业，惊闻爆炸声后仓皇逃入密室，返回西柏林。其入口迅速自动堵塞，使苏军难以进入。

窃听事件让苏联高层极为恼怒。美、苏对此进行了

高层接触，同意低调处理此事。此后，莫斯科称美国人搞地下活动他们早就知道，因此发放了很多假情报以愚弄美国。也不知这些解释是为了挽回面子，还是果真如此。

1961年8月柏林墙建成后，苏方重新检查了通讯电缆。但西方情报人员透露，这建成的柏林墙倒成了间谍活动的掩体，苏联人发现的仅是隧道的其中一段，尚有隐秘地下隧道一直未被发现，它们继续运作，直至柏林墙被推倒

华沙条约组织建立

《北大西洋公约》签订后，为阻止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苏联曾提出缔结对德和约主张，被西方国家拒绝。1954年10月23日，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签订《巴黎协定》，决定终止对联邦德国的占领，吸收它加入北约组织，并允许其重新武装。在此情况下，苏联等8国于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欧洲国家保障和平和安全的会议，宣称要在组织武装部队和建立联合司令部方面采取共同措施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苏联、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8国于1955年5月14日在华沙签署了《华沙条约》，并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华沙条约由序言和11项条文组成。规定缔约国保证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它们的国际争端，并就一切有关他们的共同利益的重要国际问题进行磋商；如果在欧洲发生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武装进攻，每一缔约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个别地或通过

同其他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助。华沙条约组织最高决策机构是政治协商委员会。华约常设机构在莫斯科。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参谋长均由苏联人担任。1989年东欧事变发生后，华约解体。

随着西德的重新武装以及华沙条约的签订，东西方对立已成定局。

奥地利国家条约结束外国的控制

1955年5月15日。奥地利国土上将只保留奥地利军队，这是17年来的第一次。该国自1938年被希特勒霸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进驻。今天签订的条约主要规定了奥地利将作为一个缓冲国在苏联集团国和西欧民主国家间保持中立。

条约制定，奥地利不可签订任何军事同盟或允许任何外国军队在其领土上驻扎。条约的其余规定均对奥地利有利，包括不支付战争赔款。苏联回绝了全部对其油田所有权的要求，并有可能帮助她重新组建军队以保卫她的中立地位。

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长麦克米伦分别代表各该方签署该条约。条约规定所有外国军队必须在本年底撤出。美国已经指责苏联在会谈中闪烁其词，以使其4.5万人的军队继续留在奥国。

“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失事

1955年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采访的中国、波兰和奥地利记者共11人，他们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此外尚有印度高级驾驶员德·克·贾塔尔上尉和其他7名机务和服务人员。他们乘坐由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自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机上全部人员遇难。

现在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中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碑上刻着周总理的亲笔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石碑的背面刻着十一位烈士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还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碑文的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有3位幸运生还的乘务人员他们是，副驾驶员狄克西特、领航员帕塔克、地勤机械师卡尼亚。他们回忆说：

飞机于4月11日12时15分自香港起飞，天气很好，飞行情况完全正常，与地面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大约在当地时间下午四时五十分光景，正在纳土纳岛附近上空正常飞行，突然听到了一声爆炸声，浓烟随即进入机舱，行李间发出了火警的信号。于是，立即打开灭火器，向行李房内喷射，然而无效。机长随将情况的严

重性告知乘客，当时机舱内已充满浓烟；但十一位乘客都坐在各自的原座位上，非常镇定。遵照乘务员的意见，他们都穿上救生衣。接着，舱外冒出了一股火苗，并且迅速蔓延到飞机的右翼。这时整个飞机的内部，包括驾驶舱都弥漫浓烟。他们向地面几次告急，本想选择附近机场降落，但已来不及。机长贾塔尔决定立即向水上降落，飞机已经完全失去平衡，下降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飞机相当猛烈地碰到水面，机头与机身分裂成两段，他们三个人就是在这刹那间从飞机分成两段的空隙中被抛出海面，接着机头与机身几乎立即下沉。

他们被抛出海面后，游了一段路，到达一个小岛，后来被英国的快速护航舰“丹皮尔”号救出，并送到新加坡。

冰岛拉克斯内斯获诺贝尔奖

哈尔多尔·基里扬·拉克斯内斯(Halldór Kiljan Laxness, 1902-) 冰岛作家。出生在冰岛首都雷科雅未克，在自家经营的农场里，度过童年时代。他最早的启蒙都是他认为有生以来所认识的最有独立性格的女性——他的母亲。

1914年，他到首都求学。高中文凭还未拿到手，他便离开了中学。17岁时出生了小说《自然之子》(1919)，全局全书充满了乡野间的浪漫。同年他离开冰岛，到欧洲大陆旅行。1927年，他发表重要的、充满内省的自传体小说《伟大的克什米尔织工》。1927年至1930年，他先后旅剧加拿大和。这个时期，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1930年，他回到了祖国。此后的十年间，接边写出

了以冰岛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为题材的三部长篇小说：《莎尔卡·瓦尔卡》（1931-1932），《独立的人们》（1934-1935）、《世界之光》（1937-1940）。这三部作品可以说是世界文学红色的三十年代中的重要成果。

二次大战期间，拉克斯内斯又创作了总称为《冰岛钟声》的3部长篇历史小说：《冰岛钟声》（1943），《浅发女郎》（1944）、《哥本哈根的火光》（1946）。小说描写了17世纪冰岛人民反抗丹麦人统治的斗争。拉克斯内斯还以极大的政治敏感写了现代题材的小说《原子站》（1948）。1960年，发表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重返乐园》。除小说外，拉克斯内斯还创作或改编了多部戏剧，并有散文诗多种。

1955年，为了他在作品中所流露的生动的、史诗般的力量，使冰岛原已十分优秀的叙述文学技巧更加瑰丽多姿，拉克斯内斯获诺贝尔文学奖。

小资料

1955年6月，苏联建成世界第一座核电站。